

一位喪兒父親的蛻變¹

王純娟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索一位父親在經歷了孩子驟逝近四年來的蛻變。這位父親 F 的孩子因九二一大地震而去世，研究者在震災後兩年又四個月時進入 F 的家庭，在初期的接觸，F 表現客氣卻拒人於千里之外、抗拒且不信任研究者，後來轉而願意接受深度訪談，甚至接受心理治療邀請，探討其態度的轉折與轉折契機、心理治療後的蛻變是本文的目的。

研究的最基本前提乃視 F 為一整體，全程以民族誌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者以不同的互動型式蒐集 F 的哀慟資料。從與 F 家庭歷時 18 個月，共計 40 次接觸中，本研究選擇其中三次長談、一次錄音深度訪談和七次晤談作為檢視其蛻變之依據。這些接觸時間共計超過 30 小時，資料分析乃以接觸後 24 小時之內的田野筆記（或訪談筆記）和逐字稿作為基礎。資料分析得到以下三蛻變：關係的建立與契機、因震災的喪兒經驗所帶來的影響與經歷七次晤談的蛻變。

就第一個蛻變而言，本文探討三個可能促發 F 從不信任到全心分享他的故事的契機。就第二個蛻變而言，F 的哀傷有其普遍性和獨特性，對 F 個人亦有深層的影響。就第三個蛻變而言，治療者以個人中心學派治療模式介入，F 逐漸發展出來的蛻變的主題亦有三：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主人、換個角度看事情、對退休的惶恐。

關鍵字：九二一大地震；民族誌；哀傷心理治療；個人中心學派；喪兒父親；驟逝

壹、背景：喪兒哀慟文獻與九二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全台灣 2,444 人罹難（行政院九二一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0），亦即有數以千計的家庭遭逢喪親之慟（bereavement）。無數人的某部分人際關係被迫中斷，而且是不可逆地（irreversibly）中止關係；許多人也因震災而有了新的身份，如：孤兒、鰥夫、寡婦、殘障人士，這些身份的背後，即可能是一段段的哀傷歷程。

哀傷（grief）是個體失去至愛者的一個自然現象（Charkow, 1998; Corr, 1998; Shuchter & Zisook, 1993）。在成人的喪親經驗中，子女去世比失去配偶或父母更來得難以忍受、應對，甚至可能是最難過的一種失落（Parkes, 1986）。針對喪兒的父母親而言，過去研究多聚焦在母親（如：李雅玲、陳月枝，1992；Farnsworth & Allen, 1996; Rubin, 1981, 1999; Talbot, 1997, 1999），或是父母親一併被檢視（如：林家瑩，1998；葉何賢文，2003；駱麗華、陳蓉蓉、陳月枝，1981；Bohannon, 1990; Brabant, Forsyth & McFarlain, 1995; Cook, 1983; Klass, 1988, 1993; Murphy, 1990; Murphy et al., 1999; Rubin, 1992, 1999; Schwab, 1995; Wheeler, 1999; Williams & Nikolaisen, 1982）。父親極少被單獨有系統地進行瞭解，直到近年才被蒐尋到一篇研究發表（Wood & Milo, 2001）。

台灣至今共有四篇瞭解喪兒父母親哀傷經驗的論文。在 1981 年，有護理領域工作者針對一對夫妻在七歲半的孩子與病魔掙扎三年半後喪生，在孩子死後半年所探索的夫妻的哀傷歷程（駱麗華等，1981）。其後有李雅玲、陳月枝（1992）針對八位喪兒母親進行研究，再來則是林家瑩（1998）和葉何賢文（2003）分別對十三位與六位喪兒父母親進行個別深度訪談。除了李雅玲、陳月枝（1992）單純以母親為受訪對象外，其他三篇均合併報告父母親的哀傷歷程：父母親在喪兒後的哀傷經驗，在生理、認知、情緒、行為等方面都會以不同的樣貌呈現。而此三篇論文也一致地在父母親的哀傷反應方式發現不同之處：父親較不容易表達哀傷；這也幾乎是目前在父母親哀傷經驗中，唯一一致的發現（如：Wood & Milo, 2001; Worden, 2002）。此外，林家瑩（1998）特別發現，父母親在認知方面最為一致且貫穿哀傷歷程的是「轉念」，例如：復原需要時間、負起責任（喪兒之慟

Chinese Annual Repor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VOLUME 20

September, 2006

- The Psychosocial Transition of a Bereaved Father
-----*Chun-Chuan Wang*----- 1
- Why Marriage? A Study of the Commit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gaged Couples in Taiwan. -----*Wen-Yi Shieh*----- 51
- The Challenges of Gay/Lesbian Couple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Their Coping Strategies-----*Wen-Yi Shieh*----- 83
- Study o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Person-Centered play therapy
initialized on a mentally retarded client with life adaptive behavior
disturbance-----*Chung-Hui Hsu, & Miao-Jung Lin,* -----121
- A Study of Improving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y Applying
Music Exploration Activities
-----*Wei-Ling Lee, Li-Jung Chang, & Shih-Ho Kuo*-----153
- An Investigation in Communication of Sex between single parent
and the adolescence-----*Yun-Chung Chang & Yen-Chin Lin,*-----175
- Counseling LGBT Youth:A Survey Research of Attitudes towards
LGBT and Training Issues for School Counselors
-----*Anchen Liu & Shuchu Chao*-----201

The Chinese Guidance Association

ISSN: 1728-5186

要靠自己走出來)和活在現在。而且,一般以為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喪兒之慟必定造成複雜的哀傷(complicated grief),在這些研究喪兒父母親的文獻中並沒有發現。林家瑩(1998)和葉何賢文(2003)都支持:父母親的哀傷是以流轉、變化的型態不斷進行,也不斷地消弭。事實上,影響哀傷反應的因素眾多(參考林家瑩,1998; Parkes, 1986; Rando, 1986; Sanders, 1993; Worden, 2002),不能以單一因素解釋或預測,因此,雖然喪兒是成人哀傷經驗中最難忍受的一種,但我們亦不可就認為喪兒的父母親一定會有複雜的哀傷。

在父母親被相互比較的文獻中,除了「父親的哀傷表達較為內斂」的結果之外,其餘並未獲得一致的結論。例如:Bohannon(1990)和Rubin(1992)發現母親有較多的情緒反應或生理症狀,Cook(1983)發現母親比較難以因應失落、且較疏離配偶;父親則被發現較採否認的態度(Bohannon, 1990),但Williams和Nikolaisen(1982)發現父親—相較於母親—對孩子去世較有現實感,有較多感受,但也較能夠採取行動以解決問題。然而,Wood和Milo(2001)並沒有發現父母親有任何哀傷經驗的差異。Murphy等人(1999)的縱貫研究發現,母親們的心理症狀會隨著時間而遞減,而父親遞減的症狀種類較不似母親那麼多,而且在喪兒的第二年,有些症狀甚至回昇。Schwab(1995)是探討哀慟父母親參加支持團體與否的原因,Brahant等人(1995)則是探討父母親的社會支持系統。

僅以父親作為研究對象以有系統地瞭解其喪兒經驗者,目前只發現一篇(Wood & Milo, 2001),他們針對的是孩子有發展性的障礙(developmental disability),去世時在五個月到十六歲不等的父親。從「哀傷經驗量表」(Grief Experience Inventory,簡為GEI)所獲得的量化資料發現,父親的哀傷經驗並無異於同樣有發展性障礙的孩子死亡的母親、和GEI的常模群體的哀傷經驗。然而,從訪問資料中,研究者發現父親們反映出一種雙重的失落(a double loss):孩子在殘障之後又早逝。父親的因應策略也傾向以讓自己忙碌、找事情來做,但在獨處時,孤立(isolation)與孤單(aloneness)的感覺便全面襲來。

在台灣,自2001年起,有關喪親經驗的研究大幅增加,與九二一震災相關的心理、諮商、社工等文獻亦陸續問世,其中真正針對九二一喪親哀慟者的有九篇,但未有僅針對父親進行研究之文獻²。從我與因九二一震災而喪兒的母親和父親的深度訪談中,許多母親認為配偶比自己更難過、無法接受,父親與配偶在表達哀傷的方式並不相同(後一描述與文獻一致)。故而,本文將以其中一位喪

兒的父親（本文以下皆以 F 代稱）為研究對象，瞭解他喪兒近四年時的經驗回顧與歷經的改變。

由於進行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之需，我邀請家中有未成年罹難者的母親進行訪談，而得以進入這個家庭，進而獲得 F 同意受邀訪談，更接續晤談。在這段期間內，一個外來的專家學者要進入哀慟者的家庭—和內心—蒐集資料，對哀慟者而言，是揭開他們最深層的慟，F 從抗拒和不信任到信任，其態度的轉折與轉折契機的探討是本文的目的之一。而當信任關係建立、且 F 接受晤談邀請後，F 的蛻變的探討也是本文的另一個目的。以下，我從 F 的資料具體說明本文的目的。

當我開始接觸 F 的家庭時，由於孩子已長大在外地，經常是 F 與妻子同時在家，基於禮儀，我們也會有寒暄、問候、甚至聊天等人際互動。根據這位父親，他一開始是這樣看待我的出現：

F230³：…坦白講，以前妳來的時候，我的感受是…反正妳就跟那些人一樣嘛，妳就跟那些…到大愛村…我們到大愛村那邊，一天到晚人家來關懷啊什麼的，有的沒有的，我說妳就跟那些人一樣；但是呢，妳採訪的時候，我還是認為是那個樣子，我還記得我當時…對妳的角色…只是純粹「啊，妳要問，我就給妳回答…」

I231：（笑）唉…

F231：真的，我有一點點…不信任，但是呢，妳把書丟給我的時候，我就知道…欸，妳是真的，妳不是假的。

I232：哪一本書？逐字稿，還是？

F232：妳不是丟一本書嗎？不是在那之前丟一本書嗎？

I233：我編的那本喔？

F233：對啊，對啊，對啊…

I234：喔，到那個時候喔…

F234：到那個時候我才肯定…妳是真的要…真的是…是…是把它當一回事。

I235：那個時候…那才是…半年前的事情而已欸…

F235：對，對…

對話中所提到的我「丟」的那本書是我所編的災後心理重建演講輯錄（王純

娟編，2002)。我親自送到 F 家門口的那天距離我第一次造訪 F 家已有十一個月之久，這段期間與 F 家庭的接觸，全部與妻子受訪事宜有關。從送書給 F 家，到 F 讀完該書、真正有機緣得以訪問到他，又是半年以後的事。上述的對話即是由訪談內容節錄出來。F 的家庭自九二一災後曾遷至大愛村，有很多的社福團體、學校單位前往大愛村關懷協助居民或蒐集研究資料，F 看在眼裡，不會拒絕或惡言相向，但也只是「你要問，我就回答你」的「配合」態度。我的造訪只是讓 F 看到另一個「就跟那些人一樣」的人，他說「面對不可以講的人，他就說場面話」（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⁴），他不打算真實地表達其喪親經驗；但是後來 F 不但同意受邀訪談，接下來更持續了七次的晤談。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探索 F 從一開始的不信任，到願意接受邀訪，更同意接續晤談，這其中態度的轉折與轉折契機。

這唯一的一次訪談共花了六個半小時。在結束後的一個小時，我主動邀請 F 進行晤談。根據我在事後撰寫的訪談筆記（interview note）⁴：這個訪談「到很後面，其實越來越 therapeutic」，基於看到了 F 在情緒上把自己繃得很緊，像是一個壓力鍋，不知何時心中的壓力就要爆開，我在訪談結束後，主動邀請 F 進行晤談：「你要不要有人來陪你走這一段？」我看到 F 像一個壓力鍋，比較具體的訊息是從 F 自陳「從地震後，常常想到什麼（和喪兒有關的事）、或是投入自己正在發明的作品（與喪兒經驗有關），就睡不著了」可以看得出來；而在第一次較完整的談話（2002 年 1 月底）後，我在田野筆記（field note）中寫下：「F 相對於妻子，是健談的，是有意見的，但是，也可能是有談的需求...」，這份我所解讀到的「談的需求」，或許是壓力鍋正在沸騰中。另外，就我個人的部分，因我投入九二一災後心理重建的心力甚深⁵、自認專業敏感度甚佳，而且，在當時方經歷了學生驟逝、訪談的前一天又看到某大學教授心肌梗塞驟逝的新聞，因此，為避免這個壓力鍋爆開，「I guess I can do something, 而且我也願意」（引自「訪談筆記」）就成了我主動提到諮商之事的緣由。在這段邀訪的過程中，F 並非沒有猶豫的：

F 看起來很沈重，我聽起來也是。一陣子後，又談回邀訪，他欲哭而沈重的表情，非常深層地，總共有兩次。有一次，我記得他說...with the same look, 「我有那麼嚴重嗎？」（引自「訪談筆記」）

在同一次對話中，F 表現了另一次的抗拒：

他說：可是假如是朋友，已經認識了很久還好…，這樣好像妳是醫生我是病人…被人家看穿的感覺，好像只有在電視才會看到…(引自「訪談筆記」)

但是我回應：「你以前也沒有想過要發明東西啊…」(有關 F 發明的作品，後將詳談)。雖然我異於平常地強烈邀請 F，但我仍記得說：「可是不管你決定怎樣，我會尊重。我生平最討厭逼人家做什麼事了…」(引自「訪談筆記」)。在那樣的情緒和互動下，F 良久後同意了，並約好晤談時間。訪談後，我與 F 共有七次晤談，探索這段晤談歷程中，F 的覺察和改變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應該也有助於建立台灣的父親哀慟文獻。

在整個接觸 F 的歷程中，我以兩種角色出現：先是訪問者，再來是治療者。首先討論研究者的角色。在進行研究訪談時，重要的不只是受訪者所談內容的蒐集，訪問者也要能夠讀到受訪者的非語言訊息 (Berg, 2004)。另外，Berg (2004)、Neuman (1997) 與 Patton (1990) 都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要建立融洽 (rapport) 的關係，亦即訪問者尊重受訪者且視其所言為重要；Lincoln 和 Guba (1985) 則是強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respondent) 互動的品質，研究者身為 human instrument，要善用其即席回應、澄清的優勢，經常反思自己的介入，才得以獲得被研究者的全然瞭解與合作。因此，訪問者與受訪者所建立的關係與互動的品質，決定了訪問者所獲取資料之品質，亦即，關係的建立與資料的品質決定研究者所蒐集的資料能否真正貼近受訪者的經驗。

接下來是治療者部分的討論。諮商或心理治療其實是另一種帶著目的性的談話。對於助人工作者，Sharf (2004) 指出：「諮商或心理治療是指一位助人者與一位或以上的案主之間的互動。…助人者利用他有關人格理論與有關心理治療或諮商理論方面的知識來協助案主增進其生活功能。…」(第 3 頁)。Clara E. Hill 和 Karen M. O'Brien 所提出的「助人三階段模式」，將助人者定位在導師或教練的角色 (林美珠、田秀蘭譯，2000)，助人者是一個催化諮商歷程的專家，也教導案主為自己的問題做出決定或改變。Corsini (2000) 則是精確地區分出：諮商強調的是專家提供訊息、建議，是以問題為導向，而心理治療則是治療者協助案主發現造成自己困擾的因素之歷程，是以人為導向。Corsini 認為，諮商師基本上

是一位教師，而治療者是一位偵察者（detective）。對於介入「喪親」這樣敏感、深層且私人的（personal）終極失落經驗，我認為助人者需以「人」為導向的心理治療的方式介入，予以協助⁶。

雖然研究者不等同治療者，但是，若訪談有失落經驗者，僅僅表達哀傷本身就是一個治療性的經驗（therapeutic experience）（Parkes, 1995），訪問者需要有許多技巧，以提供適切的支持（appropriately human support）（Cook, 1995; Parkes, 1995; Rosenblatt, 1995）。Rosenblatt 更具體地說，當研究訪談的主題會激起受訪者的情緒，通常需要訪問者有很好的傾聽、大量的同理和人際的溫暖（human warmth）。因此，當哀傷是訪談的主題時，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與互動、與情緒支持的重要性相形提高，這些變項似乎也對應到心理治療中，以人為導向的兩造關係。

綜合以上之探討，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視一位喪兒父親為一整體（wholeness），瞭解其在喪兒近四年以來的蛻變，其中包括與我於不同型式互動所可能產生的蛻變，細述如下。F 的孩子因九二一而喪生，如此深刻的經驗很難不在個體留下烙印；同時，也因九二一喪兒而引發我的造訪，但 F 在大愛村的歲月裡看盡人間冷暖，使得他起初採消極抗拒的配合態度，但最後終得以建立穩固的信任關係，而同意邀訪，這也是一種蛻變；F 也同意繼續晤談，而 F 在經過晤談歷程後，或許也有一些改變。這些都是本研究意欲探討的方向。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全程以民族誌（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民族誌是探討一個現象的改變歷程（LeCompte & Goetz, 2001），其理論傳統（theoretical tradition）是研究者浸淫在其所研究的現象中，執行大量的田野工作（intensive fieldwork），並於期間或之後詳加記錄為田野筆記，作為資料分析的素材（Patton, 1990），所蒐集的資料若以描述的方式（「民族誌的描述（ethnographic narratives）」）呈現，將有助於讀者直接進入被研究者的世界（Berg, 2004）。它同時也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與所蒐集到的民族誌資料極具關係（LeCompte & Goetz, 2001），故而，在此一段落中，除了與 F 有關的基本資料、

接觸時間、與資料分析方法之外，我在田野中的角色與立場也將一併說明。

一、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F，年近五十，大學畢業，任教職；是原生家庭中的長子、家族中的長孫，備受家族的寵愛、期待與安排。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小女兒的去世，現在家中尚有妻子與大女兒共三人。

二、接觸的時間

第一次接觸 F 的家庭是在 2002 年的 1 月，主要是爲了邀請母親受訪，故而與 F 的交談多是簡短的寒暄、問候，之後他就很快地離開訪談的現場。這期間，F 真正在我和母親的訪問或談話的場所坐下來進行較長時間的對話，共有三次，分別是 30 分鐘（2002 年 1 月底）、一個小時餘（2002 年 8 月）與兩小時（2003 年 4 月）的談話。根據前述由逐字稿節錄出來的對話（第 4 頁），雖然在 2002 年 1 月和 8 月有較長的對話，F 此時仍處在對我「不信任」、認爲我也是「跟那些人一樣」的專家學者；這段時間也仍是以母親爲主要的接觸對象，之後繼續連繫則是我想要邀訪 F 和大女兒的關係建立歷程。

在質性研究文獻中，單次接觸被研究者爲時在兩小時以上者不乏其人，諸如林家瑩（1998）、范幸玲、卓紋君（2004）、黃慧涵（1992）、Armour（2003）與 Davis 等人（2004），其中亦多爲受訪者自身哀傷經驗之報告。在訪問者與受訪者得以聚精會神的前提下，讓受訪者暢所欲言其哀傷，或許所獲得之資料更能貼近其真實的經驗。

成功邀請到 F 受訪是在 2003 年 6 月，訪問費時六個半小時，一次完成；除了 F 要求部分內容不錄音之外，全程錄音。在訪談結束之後，因我邀請 F 進行晤談（緣由見〈背景〉），而約定在下一次的碰面進入治療歷程。兩個月內共進行七次晤談，由於時值暑假，兩造均較無行程，除非晤談後我另有行程，否則我傾向讓 F 暢所欲言，但必須在我精力得以負荷的範圍內。故而，在七次晤談中，每次都在上午 10 點開始，每次費時 2 至 4 小時不等。地點都是在 F 的家中。在九二一接近四週年之時，因爲我工作異動而結束晤談。故而，至 2003 年 8 月底爲止，整個與 F 家的接觸歷時 18 個月有餘，共有 40 次或深或淺、或長或短的接觸。

三、角色的轉換－從訪問者到治療者

訪問與心理治療都是有目的性的談話（Berg, 2004; Corsini, 2000）；訪問者與治療者這兩種角色之間的共同性，或許就是 Lincoln 和 Guba (1985) 所說的 human instrument 一詞。當研究者（訪問者）以人（human）的角色出現，他得以覺察受訪者所提出的內容、或臨場的情境，同時多面向地回應、澄清、總結，甚至可探索受訪者特有的回應等（Lincoln & Guba, 1985），這也是治療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若真要對兩種角色做出分野，我個人認為在於是否需要蒐集資料和心理動力之強弱。研究者的訪談需要顧及是否蒐集到符合研究目的的資料，故而可能「心有旁騖」，因而所投入的心理動力層次稍淺。

就治療者而言，人性論是任一想要解決人類問題的理論都必須提出的觀點（Stevenson, 1987），治療者的風格又與其人性觀有關，本研究目的之一乃涉心理治療，故有必要對治療者的人性觀作一說明。我個人偏向個人中心學派（Person-Centered Approach, PCA），PCA 相信個體有一股具建設性的內在潛能（稱之為「實現傾向」，actualizing tendency），祇要個體在一個自由、成長的氣氛中，這股內在的實現傾向將引導他（她）實踐最大的潛能。基於這個人性假設，Rogers (1957, 1959) 主張，要達到人格改變（personality change）的心理治療，治療情境需要滿足以下六個條件（conditions）：人際關係中的兩人有心理上的接觸（psychological contact）的前提下（條件一），其中一人（案主）是處在一個不一致、受傷害、或焦慮的狀態（條件二），另一人（治療者）在這份關係中的內在聲音與外在經驗是一致的（條件三）、他對案主能夠無條件正向關懷（條件四）、他對案主的內在參考架構有一同理心的瞭解（條件五），而且案主能夠知覺到—最少是在一很小的程度—治療者對案主的無條件正向關懷和同理心（條件六）。此即 PCA 的心理治療理論中的六個歷程因素（Rogers, 1959），Rogers (1978, 1979/1980) 將之視為中心假設（central hypothesis）。PCA 認為，這六個條件是有效心理治療的充分必要條件，亦即有效心理治療無需上述六個以外的條件。其中一致、無條件正向關懷、同理（即上述條件三至五）是治療者所表達的三個態度。因此，一位催化者（facilitator）以此三態度營造出一個如是的氣氛，案主置身其中，其實現傾向逐漸回復，便可自然地引領自己往建設性的方向前進。

我本身由於專業訓練背景是心理諮商，頗為熟悉諮商理論和技巧，過去亦修

習過若干質化研究的課程，因此，如何問話以獲得資料、如何面對案主情緒溢滿的情境，都修習過也有實務經驗。在哀慟研究的訪談實務上，當受訪者提及傷心之處，我的經驗與 Cook (1995)、Parkes (1995) 和 Rosenblatt (1995) 所言一致，確實必須提供情緒支持給受訪者。此時我心中的首要順位是受訪者，而非訪問題綱，因為我相信「我把他當回事，他才會把我當回事」；若站在我個人的立場，我在意的不只是有無蒐集到資料，而是蒐集到的資料能否真正反映受訪者的真實狀況，而非「配合」態度下的產物；此亦即 Lincoln 和 Guba (1985) 所強調的資料的品質。哀慟研究訪談所可能帶來的情緒需要治療技巧的介入 (Cook, 1995)，與治療者所使用的技巧亦有所交集。在實境中，當我與 F 互動時，兩種角色若真要轉換，也是在一瞬之間。

在專業生涯中，我都是以 PCA 的理論架構作為我在教學與諮商實務的準則。尤其是在一對一、有目的性的人際互動中 (如心理諮商、訪談)，我都是表現 Carl R. Rogers 所提及的三態度，不會有技巧介入，同時，我也傾向讓受訪者或案主帶領我，這也是 PCA 異於其他學派的特殊之處 (Bohart, 1995)。這個「允許自己被帶領」的前提，我認為是相信對方。雖然案主有「問題」而前來諮商、雖然受訪者情緒滿溢，但都不會削弱他們的存在所可能擁有的實現傾向，他們應是最明白自己何處受傷最深、需要多少復原時間...等 (雖然此時此刻可能無法明顯看出)，只要治療者提供一具成長性的氛圍，信任案主的帶領，他的實現傾向將發揮積極的功能。

四、資料分析方法

(一) 資料蒐集與記載

在本研究中，我與 F 之接觸過程已如前述，本研究所據以分析之資料則如表一所示，分別是三次較長的談話、一次深度訪談、和七次晤談。在這些資料中，深度訪談除了因有錄音，得以謄寫成逐字稿，並於謄寫完畢後，請 F 複檢修改之外，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仍在 24 小時內完成訪談筆記；三次談話與七次心理治療都是我在與 F 接觸之後，在 24 小時之內所做的田野筆記。

表一
與 F 接觸的型式、發生時期、歷時與記錄方式

接觸型式	發生時期	次數（時間）	記錄方式
第一次較長的談話*	2002 年 1 月底	1（30 分鐘）	24 小時內的田野筆記
第二次較長的談話*	2002 年 8 月	1（1 小時餘）	24 小時內的田野筆記
第三次較長的談話*	2003 年 4 月	1（約 2 小時）	24 小時內的田野筆記
深度訪談	2003 年 6 月	1（6.5 小時）	逐字稿(錄音、謄寫、F 修改)；24 小時內的訪談筆記
心理治療	2003 年 6-8 月**	7（約 21 小時）	24 小時內的田野筆記

* 本文若引用該次的田野筆記，則簡寫為「第 X 次長談筆記」

** 這七次晤談分別在：2003 年 6 月 25 日、7 月 2 日、7 月 11 日、7 月 24 日、7 月 31 日、8 月 7 日、8 月 21 日。本文以下若引用該次的田野筆記，則簡寫為「第 X 次晤談筆記」

進行民族誌的資料蒐集時，主要會使用到參與者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與不同形態的訪談，蒐集到的資料則聚集在研究者所作的田野筆記。當觀察是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時，田野筆記是研究者在參與田野時、觀察後的記錄資料。根據 Patton (1990)，田野筆記要包含研究者所認為值得觀察的任何東西的描述、在田野中人們直接的對話、觀察者自己在田野中經歷的感受、反應、對個人的意義，以及觀察者的洞察、解釋、初步的分析等；Berg (2004) 則是認為民族誌的田野筆記應以完整、正確、詳細為原則。若資料的蒐集方法主要是錄音訪談，則訪談筆記變成較為輔助的性質，它有兩個功能：一是協助訪問者形成新的問題，另一功能是有助於後來的資料分析 (Patton, 1990)。

本研究深度訪談的部分，所做的筆記即為訪談筆記，較是輔助的性質，而另兩種接觸型式（較長的談話、心理治療）所獲得之資料則是屬田野筆記，是在與 F 互動後才進行的記錄。與 F 互動所做的田野筆記，即如 Berg 和 Patton 所言，記錄兩人依序的直接對話、治療者對 F 與情境的觀察、治療者的洞察、初步的可能性的詮釋等，盡最大的能力做到詳實；而訪談筆記特別著重在錄音前與後的對話與觀察、錄音時受訪者的肢體動作、神情等資料，即是著重錄音機不能收錄之

訊息。

在本文〈研究結果〉段落中所引用的文字，若來自田野筆記，將在引言後標示來自「第 X 次長談筆記」或「第 X 次晤談筆記」，而逐字稿的引用，以“F”開頭代表受訪者，“T”開頭代表訪問者，依序成對編號，置於對話之前。整篇逐字稿共有 604 對對話（即 F001 至 F604；I001 至 I604）。為忠於筆記與逐字稿中所載之原貌，所引用文字可能中英文並陳。

（二）資料分析方法和步驟

本研究將以民族誌研究資料經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民族誌的描述」—來呈現 F 的蛻變。一如前述，利用這樣的呈現方式，讀者可以直接進入被研究者的世界（Berg, 2004）；而且，就所歸納出來的類型（patterns）的正確性而言，類型本身足夠清楚地表達也是民族誌信度之一種（LeCompte & Goetz, 2001）。

2003 年 9 月始，是我從接觸哀慟家庭以來，第一次和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城鎮內，這樣的距離讓我在研究歷程的反思之外，更得以沈澱自己的經驗。直到 2004 年 6 月才開始進行資料分析。從 6 月至 8 月，所有的資料共進行了三次分析。第一次分析是在 6 月底，將原始資料初步歸類出「F 於災後近四週年與九二一有關的反應與看法」、「九二一喪親經驗迄今的影響」、「蛻變」、「信任關係的建立」和「對受訪者的瞭解」等，第二次分析是在 7 月底，依循我的思緒脈絡做了如下之修改：將「信任關係的建立」置前，因為我認為要有信任關係的建立，方得以有此研究之發現；接續的是「對受訪者的深度瞭解」，再來是「蛻變的起始狀態」下有「F 於災後近四週年與九二一有關的反應與看法」和「九二一喪親經驗迄今的影響」兩主題，最後是「蛻變」。

第三次分析是在 8 月下旬進行，上述分類的主題已然確定，然而，我將分析的角度轉回 F 的立場：無論我能否成功地與他建立關係，九二一的影響是存在、不斷、動態、且綜合的，信任關係的建立，其歷程與之後可能的變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這些主題的安排依序變成是（標題也稍做修改）：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第一、三個項下又各分為兩小類。詳見表二之左欄。

表二：

F 經歷喪兒後的蛻變

從 F 立場的分類	從讀者立場的報告順序
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	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
自震災以來的經歷與情感	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
喪兒所帶來的影響	自震災以來的經歷與情感
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	喪兒所帶來的影響
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	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
對 F 的深度瞭解	對 F 的深度瞭解
蛻變	蛻變

在撰寫〈研究結果〉時，爲了顧及學術領域內讀者的閱讀脈絡，我將把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置前，再來是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與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如表二之右欄。

五、信度與效度

LeCompte 和 Goetz (2001) 對於民族誌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有詳盡的討論，本研究將以其所提之降低信度與效度之威脅因子，作爲建立本研究信度效度之參考。

因爲民族誌的研究情境、所建立的研究關係、與所蒐集的資料等都難以複製，提高其信度與效度的方式就著重在研究歷程中 (LeCompte & Goetz, 2001)。LeCompte 和 Goetz 認爲，詳細地描述研究者的角色、被研究者的選擇（若被研究者不只一人）、研究情境、理論假設與前提、和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得以增加外部信度；這些都是本研究至今竭力進行的。至於 LeCompte 和 Goetz 所提到的提高內部信度的策略，本研究做到的有：使用精確而具體的引言 (low-inference descriptor)、使用謄錄的資料等，這些將在〈研究結果〉呈現；同時，我在不同時間對同一份資料進行重新分析，也是內部信度之一種。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採用 LeCompte 和 Goetz 所分類的內部效度。我將本文之初稿（完成約 95%）與逐字稿提供予 F，請 F 就〈研究結果〉段落檢視文章內容的正確性、所描述的心理流動是否是他回溯當時自己的心理脈絡，以及再一次地確定這些訊息是可以公開的。從郵寄出去到收回，歷時 14 天。F 除了針對字

辭的修改、以及我所提問（一大處、兩小處）處進行書面說明外，對於我的用詞「『老』淚縱橫」（第 18 頁所引用之「訪談筆記」）有所註解，也在第 28 頁（發明作品之歷程與其代表之意涵）寫下「看到這裡，不禁『老』淚決堤」：除了 F 似乎在意被指為「老」之外，本文對 F 發明的作品及其歷程、意涵的闡述再一次地觸發 F 之心理悸動。以下〈研究結果〉段落，已採納 F 之修改、補充意見。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視 F 為一整體，根據我與 F 在不同型式的互動後所留下的文字記錄（談話、晤談：田野筆記；深度訪談：逐字稿和訪談筆記），我在知覺到自己傾向的理論假設、並在接觸哀慟者歷程中不斷地反思的前提下，分析出有關 F 蛻變之主題如下。分別是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九二一喪兒經驗所帶來的影響、與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

一、信任關係的建立與契機

一如前述，F 一開始並不信任我。而我亦由於與其他家庭接觸所累積的經驗—與母親比較起來，父親通常無法提及驟逝的孩子—而對父親角色有較多的恐懼和擔心；故而，當我與 F 妻子談話時，「F 正好回來。話題轉淺，我甚至不敢在他在時提及○○，心中希望他快快離去」（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可見，不但 F 不打算向一位他不信任的人提及自己驟逝的孩子，我亦自認要在 F 面前提及，心中會有疙瘩（「既然父親是較難以提起喪兒之慟的親代，我就不要故意在父親的面前提起」）。雖然我在前兩次長談都讀到他「有談的需求」（更逐次地肯定），但縱使到 2002 年 8 月，F 和我都仍處在一個「遠距」（distant）的狀態。但也是在同一次對話時，F 已有許多深層的自我揭露：

他承認自己還沒有走出來（原文用「爬起來」，我口頭表達對他的誠實感到驚訝），一直都是採用「模糊焦點」的方式過日子，就是不去認真地面對這個經驗。…所以其實從第一次我來訪，他談的話題（淺），到剛剛都是，都是「模糊焦點」，不敢再提…（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F 也在我意料之外地，除了提到地震發生初期的災區，也提到已逝的孩子：

失去的女兒，就像風箏斷了線，回不來了。(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除了 F 深層的自我揭露，同樣在這一次對話中，F 亦表達：

收到(太太的)逐字稿，(他自己)不敢翻開它，還是痛，後來是決定站在校稿的角度上看稿子⁷。(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這些陸續傳達的訊息，都令我相信他介於「有談的需求」與「無法信任我」之間。同時，彼時我的思索亦擺盪在忖度「我是否真的要掏開他的慟」與敏覺到「F 本身有說的需求」之間，不知究竟應該站在哪個立場來做決定。

這段期間，幾次打電話去連絡，若是 F 接到電話，在我的自我介紹之後，他通常還得在腦袋搜尋一番，似乎對我並不特別留下印象；曾經在鎮上與 F 夫妻不期而遇，F 從老遠就率先和我打招呼，但卻在遠方等候我和妻子的問候，並揮手道再見；近兩個月後，我親送到家門口、F 親手接下來的那本演講輯錄，F 讀了並因而肯定我真的把災後心理重建工作當一回事，他也是不曾表達，直到錄音訪談時才說出。縱使 F 已接受邀訪，我在與他約定時間時，我從 F 的口氣聽到他心理上已經準備好要受訪了，但他說他當時仍只是準備：「妳問什麼，我就答什麼」、「我有我的想法，我就是把它當成是提供學術資料的立場...」、「自承他會有很多的保留，不願多說」(引自「訪談筆記」)之類的態度。在過程中，我解讀到 F 不動聲色，或許是觀察我也或許是持續的心理掙扎，逐漸地，他潛在地準備好要落實其「談的需求」了，但意識層面卻仍表現出「客氣卻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配合」態度；而或許是一些契機的產生，終究 F 還是與我有一趟會心(basic encounter, Rogers, 1970)⁸的歷程。從「配合」到「會心」，我將以下三個互動視為「契機」：

(一) 契機一：自我反思

民族誌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研究者的反思(reflexivity)，它代表研究者瞭解自己是研究現象之一部分，也代表了研究者由持續的內在對話來檢視自己是否瞭解、以及如何瞭解她所欲研究的現象(Berg, 2004)。

自從我開始邀請哀慟母親接受訪談，母親們的傷痛彷彿孩子才剛去世、對要談到逝去的孩子所表現的困難、心理抗拒、延遲、甚至必須拒絕，一再地衝擊著

我，彼時我並沒有讀到學術論文傳達哀慟者的心理掙扎，我發現面對喪兒如此深層的經驗，我事先裝備的理論、閱讀的文獻幾乎找不到用武之地；實務上，我在學校體系內仍持續接案，也自詡很能感同身受，但面對哀慟母親仍有難以觸及其內心之嘆，所以，我有一段很長的自我反思，與接洽、訪談哀慟母親是同時存在、進行的。精簡言之，從我的反思，我彙整了兩個主軸：一是「我是死亡使者？」另一個則是「無論如何，日子總是要過下去，不是嗎？」

從「我是死亡使者？」主軸，我檢視自己是否避諱談論死亡的主題？所以我在田野筆記中寫下：「很抱歉挑起她的傷痛」、「我又要去煩人家，請他們談這個大家都不想再談的事」、「再談，孩子確實不會再回來啊。」我檢視自己心中擁有的死亡的禁忌（taboo）、信念，我也發現了死亡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是我的限制：除非我的孩子死去，否則我永遠無法完全地瞭解母親們的經驗。

從「無論如何，日子總是要過下去，不是嗎？」主軸，我驚異於母親們的韌性，尤其是為孩子、為生活這樣再基本不過的一生；從若干次在街上與哀慟者不期而遇，寒暄後又各自消失在人群中，我感嘆：「街上的每一個人，妳永遠不知道他們有過什麼遭遇。」我也驚異：在孩子過世的原址，新房子蓋起來了，哀慟家庭仍得依習俗地發放紅帖...等等，我存疑於心：「無論如何，日子總是要過下去，不是嗎？特別把她們的痛再挖起來，何補？何忍？真有助於世人？」

在這個堪稱痛苦的自我反思歷程，我承認了自己的有限，明白我永遠不可能完全體會他們的傷痛；從另一個角度，我卻更進一步地體會到，他們的慟絕對超乎我所能想像或感受。我也興起了更多的問題，卻不一定找得到答案。

在第二次的長談（2002年8月），我因緣際會地也向F夫妻倆分享了：

…我雖自承在專業上相當負責，F點點頭，也想說（要對）10年、100年後的學術（負責）等等，但是這樣的態度仍是踩在他們的慟之上。雖然自己很 sensitive，但永遠無法 100% 感覺到他們的感覺，除非我有一樣的經驗，但也不可能有一樣的反應。因此案，我自省很多，但卻永遠無法 100% 站在他們的立場。F 反而要我換個角度想：今天，沒有人問○○要不要被寫在逐字稿上；若問了，恐怕她也不會願意。但是不得已，也就希望名字寫上去可以有其意義。他也會是這樣的態度⁷。（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我在這一次的對話把自我反思所得的部分洞察談出來時，F 也對我做了如上的回應。除了又可以解讀為 F 有可能願意受訪之外（詮釋：「F 若接受訪談，也希望能有其意義」），研究者吸納哀慟者的心理掙扎和深層的哀痛，不斷地自我反思，或許是能夠趨近哀慟者的經驗與心境的方式之一；承認自己的有限性，或許才是更接近哀慟者的方法。

（二）契機二：鏗而不捨；細水長流的陪伴過程

在錄音訪談中，F 也提到為什麼會逐漸信任我：

F316：或許是因為妳來好幾次吧，妳不是來「沾醬油」就走，所以我才願意講。

I317：我抵死就是要賴在這裡。（笑）

F317：對啊。像之前的都是沾沾醬油而已啊，因為…因為他們瞭解其實他們要的就是那個部分而已。我雖然不是專業人員，但是我也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我就那些東西給你就好了，但是你向我要的那些，對我而言，我也沒什麼損失，但是對你們來講，可能你們認為那些資料也是所謂的資料的一部分吧，這樣。但是我是認為，因為妳來好幾次應該是有誠意，而且妳有實際上的東西，我也看過了，我也知道…

I318：那一本你有看喔？

F318：嗯，對啊，那我認為妳有誠意啊，所以我有…我才會認為我可以給妳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沾醬油」的說法是來自 F 住在大愛村一年多「送往迎來」的經驗（F262）。由於大愛村有許多的助人團體、專家學者前往提供協助、蒐集學術資料，F 看在眼裡，雖然也是「配合」接受協助、提供受災喪兒相關資料，但 F 覺得這些助人者、專家是來「沾醬油」的：

F252：…你們沒有真正關心到我們啦，因為你們有你們的基本的技巧還是什麼之類的，就像說一個慈善團體來這邊，他也只是給你們東西而已，其實對這裡的人，給這個東西來講，坦白講，你又不是第一個，好幾個了，有幫助嗎？沒有耶，沒有幫忙。但是呢，他們都不是回去檢討說，別人事後會不會記

得他？不會啦，不會啦，那是不是他們技巧本身還是什麼有問題…

I253：心意。

F253：心意有問題？對。

I254：我覺得是心意。

F 同意是我反映 (reflect) 的助人者 (或研究者) 的「心意」才是表達關懷的關鍵，也是受助者 (或被研究者) 願意打開心胸的契機之一。或許是哀慟者較為敏感、脆弱，或許他們要揭開自己的慟需要勇氣，哀慟者不希望被蒐集完資料、或助人者表現完自己的愛心之後，就一走了之。是否所有的哀慟者都需要哀傷諮商，至今未有定論 (Parkes, 1997)，或許，哀慟者不一定需要助人者的陪伴，但我認為他們至少需要助人者的尊重，把哀慟者的角度置於學術專業的考量之前，相信哀慟者存在的意義比成為「資料」還多、還深刻，這看在哀慟者的眼中，具體而行的或許就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陪伴過程。到 2003 年 8 月為止，為了訪談 F 及其家人，我與 F 夫妻共有 40 次的接觸，雖然資料已獲得，我至今仍會去探望他們。

(三) 契機三：「我覺得你有很多想講的話呢…」

F 真正將他「配合」的面具脫去是發生在訪談之中。當我反映我所覺察到的當時整體的 F (面部表情、肢體動作、語調、態度…) 而說出：「我覺得你有很多想講的話呢…」F 的下一個對話，「訪談筆記」記錄著：

F 說一串我聽不懂的話，我還來不及澄清，他臉一沈，老淚縱橫，掩面良久，足夠我站起來拿面紙折好遞給他，他也正好收拾好眼淚，準備起身，接下我的 tissue… (引自「訪談筆記」)

這「一串我聽不懂的話」，根據後來謄出來的逐字稿，F 說他已不太想說什麼了，他「已經把所有的努力，放在一樣東西身上，…把它…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F036)。這樣東西，就是我在〈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段落會提到的 F 發明的作品；也是從此處起，訪談的內容幾乎以此作品為重心。

從我的立場來看，在進入個別訪談之前，我準備了與訪問母親、手足一樣的訪問題綱，也事先讀過與 F 家庭有關的所有田野筆記，並做一個隨手筆記，於訪

談 F 時放在桌上，以備不時之需。我持有的訪談態度也一如往常；以下我用訪談中向 F 談及的話語來說明我的態度，因為正好 F 在檢驗我是否相信他所言：

I301：我跟你說我的 philosophy 是什麼。…你剛剛會講說…我來之前我一定沒有預計你會講這些怎樣怎樣的，對，原因是…我沒有預期、我沒有事先說「OK，家裡有一個孩子走了，父母就一定會怎樣怎樣…」我沒有預期，我完全沒有預期，我的預期是零，雖然我有讀書，我有讀很多的東西，但是，我相信的是，每個人都不一樣，這樣。所以我來的時候，心理上我是 well-prepared，但是我是掏空的，我是來裝東西的。

F301：妳並沒有一個問號在那邊，也就是說妳沒有想要知道是什麼答案，都沒有。

I302：我並沒有預測你應該回答這樣才可以…

F302：這我知道。

I303：我習慣的方式是，我順著你的路走，你的邏輯、你的講話方式，我跟…我跟…

我的訪談態度其實就是秉持 PCA 的特色：讓案主（或受訪者）帶領治療者（或訪問者）行進。我準備好訪問題綱，但我相信受訪者有自己表達的脈絡與方式，我將訪問題綱放心中，表現出來的是尊重、真誠、和同理，「我覺得你有很多想講的話呢…」這句話就是這樣態度的具體表現。這句話一後來也經 F 的證實一成為分水嶺（F 多次說這句話是個「藥引」，F134、F135 和 F545），F 一改先前「配合」的態度，接下來的對話內容全然改變，語調更有抑揚頓挫，聚精會神地帶領我進入他災後近四週年的心理歷程。

（四）小結：信任關係的建立

從我覺察到 F「有談的需求」、到已經準備好要談了、到會心，這段歷程或許可以解釋為：當 F 讀了那本我編的書之後，「才肯定妳（研究者）真的是把它當一回事」，但是，到訪談期中才卸下「配合」的面具，這中間有六個月之遙，或許，肯定研究者面對哀慟者的認真程度，有助於信任關係的建立，F 也比較願意說出自己的故事；但那與掏開自己的慟（需要勇氣）一卸下「配合」的面具一又是不同的層次。

所以，要強調的並非研究者該表達哪些具體的詞彙或動作，而是敏覺到哀慟者的心理需求、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與鏗而不捨地表達關懷與認真投入（在與 F 的互動中，可以用那本書為佐證），且此種種的活動都是站在哀慟者的立場，去瞭解哀慟者的感受和需求，且可為哀慟者所接收到，他們才得以相信訪問者或研究者不是只為蒐集資料才接觸他們。而在接觸期間，對案主狀態正確的反映（accurate reflection，即「我覺得你有很多想講的話呢...」）才得以讓案主願意打開自己的內心。

在我們第一次晤談終了之時，F 承認他這次才開始比較放得開。在這一次，F 突然很認真地問我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他而言，十分地重要，其實 F 明白該如何做，只是太在意這件事了。這對於具有「好為人師」特質的 F 而言（詳見後〈對 F 的深度瞭解〉段落），卸下武裝，乍變為一個不知答案的提問者，我認為實屬不易，並將之詮釋為他相信我的答案（雖然我並未給答案）。他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笑倒在桌上，我也知道自己已可更自在地與他談話。我將之視為信任關係已穩固的佐證，而且這份信任關係的建立與穩固是兩造都可以敏覺到的。

二、九二一喪兒經驗迄今的影響

在距離孩子驟逝已有三年又九個月之久的時候，F 認為自己最真實的狀況已不是依循訪問者預定的題目回答，而是以自己為一整體為出發點，表達出已經過融合的看法：

F010：…經過這三年多來，這事情不是發生在昨天或者是幾個…一個禮拜，已經這麼久了，當然改變也蠻多的，所以可能…我現在講，當然是沈澱一陣子以後的那種的感受，應該是屬於這層面比較多。

F194：…妳今天問我什麼什麼什麼，其實…我說，這個就是全部都混合在一起了，全部都在裡面了，那妳說，我怎麼樣把它抽絲剝繭出來，剝個層次出來講？我也沒本事，因為那個是都…整體都已經…已經膠合在一起了，重疊在一起了。

因此，將哀慟者的哀傷反應類別化將非本研究所能著重之處；喪親經驗要從經歷者的角度出發，因此，要真實呈現喪兒後三年又九個月的 F，就是呈現出 F

對喪兒經驗的「沈澱」和「膠合」。

(一) 自震災以來的經歷與情感

九二一對 F 而言，太突然了；當震災確定帶走了女兒，F 看著她冰冷的身軀：「那個真的是我女兒嗎？」(F003)「F 夫妻倆大約都是在震驚 (shocking) 的狀態：『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什麼經驗都沒感覺了...」、「不可置信、沒有感覺了，還有...解離...」(引自「訪談筆記」)。

F175：...就像...我現在舉個例子。我現在坐在這裡好好的，突然間，東西進來，把我手臂砍掉，那種感受就是這樣啦，就...就是這個樣子啦，瞬間發生的，你沒辦法去...你沒辦法去...去懷念、去想這個過程、或者去預測還是怎麼樣，你都不知道嘛，所以那種並不叫「悲傷」耶...

I176：嗯，不然呢？

F176：我認為那不叫悲傷，那是震驚、害怕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那麼假如用英文講，就是 shock，而且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shock，就是這樣，對我來講，那個感覺就跟這個，就是一樣的。

F176 所謂的「這個」，指的是女兒突然永遠消失，沒辦法回來，而且，「到現在為止，其實，到現在為止，我每想到這個，我大概就爬起來了，我大概就坐起來了...」(F178)。這個因女兒驟逝而帶來的震驚，縱使到地震後將近四週年的時間，其力量似乎未曾稍減。

無論是住在帳篷時、聞著飄散在空氣中的屍臭、或是看到布或棺木沒蓋好的其他亡者，都沒感覺了。在醫院聽到其他喪家的爭吵、所說出來的可憐的話，F 覺得自己還蠻幸運的，因為孩子應該沒有經歷什麼痛苦就走了，遺體也很完整。但是有一次在當地的物資集散地附近，F 碰到一位妻女驟逝的朋友，兩人一碰面，不發一語，就是抱頭痛哭。當面對火化後的孩子變成一堆白骨時，訪談時的 F 無法言喻。

原本 F 想要離開傷心地，去台中找房子了，但後來認為仍需面對、解決問題，決定延緩，暫住學校宿舍。但這段時期卻是 F 壓力最大的時候：夫妻與前來安慰妻子的丈母娘一起擠在一個小房間內，工作之餘更要照顧老人家起居飲食，更令

F 坐困愁城。後來住到大愛村，突然 F 忘了痛苦，因為「大愛村內同是天涯淪落人」，我說是「痛到麻木了，」他說對。(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

那一陣子，F 很害怕碰到朋友，「因為他們看到一定會問...」(F123)，F 選擇逃避，「逃避就是躲起來啊，不講話也不做什麼...」(F124)。但是知道 F 喪兒的熟悉的環境—如服務的學校，○○生前也在那裡就讀—也是令 F 不自在的地方，因為 F 可以覺察到大家刻意避談○○，而 F 自己也是強顏歡笑：

F131：…我現在面對我女兒同學的那一個班，我以前就跟她們嘻嘻哈哈玩在一起啊，但是，發生事情以後呢，感覺到…好像有 gap…

I132：沒辦法同樣跟原來那樣…

F132：而且這個 gap 是雙方造成的，她們也…也不要…不想要去提到這件事情，那我也知道她們在言談之中會刻意去迴避這件事情，在我面前絕對不談九二一啦，刻意的，啊我們都心知肚明啦，就這樣啊。有時候也會…看我一個人在那裡，我也是強顏歡笑啊，也是一樣啊，其實，我內心其實是很難過的，因為…因為本來她也應該跟妳們一樣嘛，可是今天她沒有了，對不對，當然啊，妳們也認為我很可憐，有沒有，覺得我好像老孤單，還是怎樣怎樣之類的，我是受害者…一大堆的，簡直是…把那些帽子戴在我頭上，什麼之類的，那麼，我也只好接受這個事實啊，對不對，本來就是事實啊，對不對，就這樣。

I133：所以外頭不談啊，不再講類似的話題等等，可是，你心裡想法多得很，你感覺多得很呢。很難過…

F133：對啊，自己也看得出來啦。唉…

對逝去的孩子，F 提到了後悔和自責兩種感受：

F198：喔～後悔就是說，當時為什麼我…不對…她好一點呢，要求少一點呢，或者是說，多跟她講一些話啊，多讚美她啊，或者是怎麼樣等等，後悔時間不能倒流啊之類的。因為我以前就是說…妳就是在這裡，妳存在，我承認妳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

F200：…後悔就是說，我為什麼沒有把我自己的工作放下來，多跟你接近，多聽你講幾句話，還是讓你怎麼樣怎麼樣，我說的後悔是這個。因為這個談不上我後悔失去她，或怎麼樣，我認為這不是這樣啊，這已經不是啦，她這不是…說穿了，也是瞬間發生的天災啊，這又不是火燒房子，你在那裡慢慢被燒死，對不對，你在那裡慢慢地死，也不是啊，瞬間就這樣子了啊…

失去女兒，對 F 而言是震驚，不是悲傷，也不是後悔；後悔是因為 F 以前對女兒多了些要求、少了些相處和正向的父女互動。而自責是：

F154：自責喔，我怎麼不怎麼樣啦，我怎麼不聽話啦，我怎麼…啊，這個，啊，那個，變成這樣啦。

九二一當晚倒下來的房子，在 F 家決定要住進去時，就有朋友提到隔壁有一堵違建的高牆，萬一倒下來怎麼辦，這個擔心並沒有受到重視；九二一發生後，F 亦因此受到妻子的責備，以及現在的自責。

我也從與 F 的互動中體會到 F 對逝去孩子的不捨。在最後一次晤談後，F 堅持請我吃飯，在餐廳這樣的公共場合中：

他很難過我要離去。…可以感覺 F 強烈的不捨，他臉上寫著世故的人在社交場合不會出現的那個「欲哭」的臉（那是我在與他諮商時才會看到的表情）。我不知道他這樣的人是如何接受再也看不到女兒的事實。光我們的 encounter 才深入這兩個月，縱使算再長一點，也長不過他和女兒若干年的相處；而且他還可能見得到我，他這一生永遠見不到女兒了；我們的關係絕不可能深於親子關係。這樣「不及」的關係的分離，F 的反應即是如此深層且不捨，他對他的女兒呢？（年數以「若干」代替，原因見註 1。引自「第七次晤談筆記」）

更無止境的是 F 害怕眼淚或情緒的潰堤與對孩子的思念，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當他們搬到現屋時（兩年前吧），他回去舊屋拿自己的東西（幾年來都放在那兒，全然沒有收拾），實在是很痛；他把一大堆的照片收拾，現在就

放在一樓，都不敢去看，「看，我想會需要勇氣？」他很用力地點頭同意。
(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

F說好像在腦中有一個空間放著一個貯存箱，裡頭有回憶、思念，但並不是都是痛苦的，也有是回想她過去的種種。F說有時候 box got open，他索性讓自己就在那兒，呆坐，直到他必須與現實連結（如有客人來、有電話等）。我說他比我想像的還自在，他點點頭。(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

隨著日子的流逝，F同意我所說的：「有些東西就是會在那邊，有些東西...會比較淡薄」(I016)。會比較淡薄的如感覺，而「會在那邊」的，就像女兒就突然地永遠消失、或思念；但是「假如說...觸景的時候，或者是說...像妳剛才提到的：『你應該有很多話要講...』像這些藥引之類的...」(F134)，這些年來F所累積、不願對人說的故事就又回來了。

(二) 喪兒所帶來的影響

上一段落的描述都是陸陸續續地與F在各類接觸型式中彙集的哀傷反應，亦即F在災後兩年多到將近四年之間的回溯。而震災喪兒所帶來的影響，F有較多的表達：

1. 從歸零到重生

F118：...那個真的是...意外的人生啦，我是認為這是意外的人生，因為我本來非常樂觀，因為我認為說這兩個女兒...應該...以後應該可以獨立了，不用我來操心了，...，但是在這個過程快要接近終點的時候，我突然間跌倒呢，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一件意外啊，我真的突然間真的跌倒了呢，跌倒後我就已經沒有力氣、沒辦法再衝了，我發現說我這條跑道也不是我要的跑道耶，那我怎麼辦？我真的徬徨了一段時間，我要怎麼辦？...

這樣的表達不只一次：

他說九二一真的是讓他到歸零的地步，過去他一片坦途，什麼都是人家為他安排好的，但這個不得已的機緣，他整個人沈澱下來、歸零，他什麼都

沒有了… (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

原本樂觀的 F，「集三千寵愛於一身」(F322)，沒有過過苦日子，現在九二一這個意外，他跌倒了，「連“why me”都講不出來啊…」(F185)，他的人生從來就是被安排的，人家幫他寫得好好的，接下來突然空白了、歸零了，他徬徨了，不知道怎麼走下去。但是，也因為這「不得已的機緣」，他必須有所改變：

F 在這裡用了一個很棒的 metaphor：他不喜歡自己的 path 需因前車受到影響，所以會超車；可是萬一隔壁車道也有車，就只好暫緩了。九二一就像如此，他被迫停在那兒，動彈不得，整個人停擺。很具象，我想到可以下車，自己走路：是的，打破牢籠，走自己的路。(引自「第三次晤談筆記」)

他說他還相信「生命會為自己找出路」(以前不信)，一個被限制自由的人，他會想盡辦法逃出去，if he cannot，他會潛心下來，往內觀照，但在意的還是逃出去的那件事。「或是他的心會逃出去」我說。他點頭。(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在訪談時，F 也說道：

F289：對，我現在也在為我找出路啊，我就是在為我自己的生命找出路，對啊，這只是一個…就是…一個 way out.

I290：找一個讓自己覺得自己還活著、然後…自己的生命還可以再次活下去的一個方式。是不是這樣？

F290：對，然後…這個方式比較…比較不一樣啦…

F061：命運給我的安排是這樣，那我也可以來改變啊！對不對？那個力量大到可以改變我的人生，那麼為什麼我的人生不能去改變所有其他的…其他的那個…既成的事實，我也可以改變啊！

I062：嗯，所以你那個很強…你的意志力很強。

F062：差不多。強到我可以坐在這裡兩個月，就坐在這裡，妳看一些紙張，妳一定會發現很多很多紙張。

F062 所描述的是 F 對他發明的作品持續的投入：不會打電腦的 F，寫完五支原子筆，不斷地修改、謄寫資料。「妳看我寫多少？就是那種動力啦...」(F090)。這個因「不得已的機緣」、「意外的人生」造成 F 必須「歸零」，不知道這個人生該怎麼走下去，反而讓 F 體會到「生命會為自己找出路」，過去「被安排的，人家幫他寫得好好的」人生，F 稱之為“page one”(F328)，他決定要自己寫 page two 了：

F328：妳看我是不是都被安排？我的前半輩子是不是都被安排，...，那我就是這樣一路順暢走過來，這樣走過來，...。所以我覺得說我前半段好像是 page one，就是一個 page，再翻也是 page one，每天就是這樣而已嘛，然後呢，突然間有一天，翻到一個...後面都沒有，後面都沒有了，不是被安排了，我自己要去想、我要去寫字啦、畫圖啦，我要自己安排。

九二一喪兒經驗讓 F 決定自己撰寫 page two，其中最具體且令 F 最堅持的，也是前述 F290 所提的比較不一樣的方式，當屬對 F 而言，象徵○○重生的一个作品。他說：

F194：...妳今天問我什麼什麼什麼，其實...我說，這個就是全部都混合在一起了，全部都在裡面了，那妳說，我怎麼樣把它抽絲剝繭出來，剝個層次出來講，我也沒本事講，因為那個是都...整體都已經...已經膠合在一起了，重疊在一起了。

I195：你這三年多來...四年...快四年的這個歷程，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個作品...

F195：對，對，對...

F530：妳平常問的，或許是妳想要知道說，我在這個方面的行為是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但我今天跟妳談的，幾乎跟這個不太一樣，就是說，我用我全部的...整個心情或整個怎麼樣，全部都變成...一個實實...我認為實實在在的東西就在那裡，那個就代表我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過程裡面的...把它不需要的淘汰掉，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就是在那邊，只是還沒有變成一個真的東西。所以現在從零到一來講，現在還在奮

鬥，可能到零點多吧，…，所以我現在的過程大概就是…妳現在正好這個時候來，那麼我願意跟妳分享零到一這個的過程是怎麼樣…。

在地震後近四週年，對事發經過的描述、不同時期的反應、變化，家庭、家人關係的檢視（即預設的訪問題綱）等，對 F 而言，是一種敷衍，不能夠真正表達他此時此刻的狀態，而是這個可以代表他「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過程裡面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才可以表達此時此刻的他。這個作品在 F 心中的意涵是把孩子生回來：

F047：我沒辦法生孩子，但是我可以生這個東西。

I048：嗯。（沈默 7 秒，受訪者走遠又回來）所以這個東西的涵義就是…你把對○○的懷念…紀念…轉化…

F048：對，把它變成一個實際的東西出來。

F111：…妳剛剛說我好像有很多話要講，的確；但是有時候想一想，我什麼都不用再講啦，我就用這樣來表示，我用這樣來做啦，那對別人來講，可能…那又沒什麼，那是新產品而已，又沒什麼，但是對我來講，意義重大啊，那不一樣，對不對…

F115：…以我的立場來講，我認為這是一個重生的過程啊，以純粹站在我的角度來講，我把這個力量，把它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出來，然後這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就是代表…代表某某人，然後呢，這個東西它是怎麼出來的，就是因為這樣這樣變成的，所以，我現在為止，我也不會有什麼哀傷、也不會有什麼，因為…我已經做好了，我這部分我全部把它完成了…

F115 所謂的「這個力量，就是代表千言萬語累積起來的，就是這個」作品（F112），所以 F 說他「什麼都不用再講啦」，而且他企望這個作品會「到處都存在」（“everywhere”，F095），這是 F 紀念○○的方式。這樣的投入，只有 F 心中的○○陪在身邊，相互對話，妻子和大女兒都無法進入 F 的這個世界，這個要令○○重生的歷程是孤寂的，無人可踰越。意志力很強的 F 說，這種動力「不是強；

它很韌」(F147)：

F309：…那實際上是…一個人而已啦，只是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在對話一樣，一直在對話對話對話，那種對話到最後變成是…不是 power，根本是一種韌性而已嘛，細水長流的那種…持續不斷的那種…。當然你在碰上什麼，你會很想把它放棄，資料一直在比對比對，那很煩呢，然後你會很想把它放棄：不然我們今天放棄它，上樓去睡覺了；上樓去，又想一想，又下來，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在這種…不斷地在那個過程裡面，我認為就是這樣才跑出來啊。因為這不是一個 spark，而是一個…真的是苦行僧，我認為是苦行僧的情況之下歷練出來的…

除了用韌性和○○建立如此的關係外，F 也想要與大女兒發展不同的互動關係，F 使用了一個比喻：

F396：欸～我有個感覺，比如說，我現在一個人站這邊，我這樣的動作（註：伸出手），可能我是要跟你握手，但是你以前沒看過我這個動作，所以你會認為，你一定會這樣，會向後退，然後慢慢地嘗試著去瞭解我什麼意思，然後慢慢地這樣（註：伸出手）。我是認為我這樣的情形有點接近，然後慢慢地，也會這樣啦（註：伸出手），對，有一點互動。

過去的 F 即是典型的負責家計、與子女少有互動的傳統父親，第一次及第四次的晤談 F 都提及：「孩子大多數是太太照顧的」、「他都沒有參與小孩的成长。」有的就是期望與安排，就像他被對待的一樣，F 說：「就是那個 “for your own good” 讓我…我從小就是被這樣對待的，我也沒有覺得錯啊，我就這樣對我的小孩…」

（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現在不一樣了。F 重新伸出友善的手，大女兒一開始也會縮回去，「對，（因為）她不知道我這是什麼意思」⁷（F397），但逐漸地也能夠有一些互動了。

2. 深遠的影響

除了具象地象徵孩子重生的作品外，孩子驟逝對 F 整個人而言，影響是深遠的：

F265：…意外的人生…真的會影響我以後耶，對不對，真的影響到我以後耶，現在就已經開始在影響了，那以後會怎麼樣我不知道啦。但是它一樣啊，我還是要面對生老病死，一樣啊，只是說我現在有轉化的一個…一個轉化的力量而已，…，轉移以後，其實每一天…我有時候心情還是會ㄌㄌㄌㄌ（註：指情緒會有高低起伏），對不對，我還是會肚子餓啊，我還是會不舒服啊，我還是會笑啊，一樣啊，我還是要過我的日子，一樣啊，只是說，這個的改變對我來說應該是影響在…日常的生活上是不會啦，但主要是決定、決策的方向或者是大方向什麼之類的，應該是那裡吧！

聽起來，這個意外的人生對 F 所造成的影響，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但是 F 又十分肯定這個影響是存在而持續的，或許是在 F 較為核心深層的部分。以下是幾個 F 曾具體提及的改變，其一為患得患失：

他說 40 歲以前的他，是想到什麼就立即去做，現在的他是想了好久，患得患失，delayed 了半天還不知要不要去做（F 用「不可諒解」來形容自己的這個改變）。問他喜歡哪一個自己？「當然是以前那個自己！」但就是因為這個「不得已的機緣」，他才會變成今天的自己。他承認自己個性變了很多，…（而且）變化就是那麼深刻⁷。（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

但是也有好的改變：

以前 20 年從來是訓導人員，對學生是教訓、直接告訴學生對的好的是什麼，現在他知道要先去瞭解一個人，不能他口渴、我們給他 bread；給對方他要的東西，才是事半功倍。（引自「第二次長談筆記」）

因九二一的種種所造成 F 的改變，也包括不以表象取人、把握當下、不再過度保護家人。因為在大愛村看到許多助人的團體，F 多不以為然，因而 F 學會「比較會根據事實來判斷，而非表象…」（F243），所以，F 會觀察哪個團體或個人是真心來協助，哪個則是在鎂光燈下或只為了自己目的的團體或個人。同時，F 也學會把握當下：從前只會看喜歡車種的目錄，現在他真的把車子買下來了。F 也

不再「基於保護、基於害怕再失去」而拒絕大女兒開車到校的請求（F398），但是，F 現在很害怕夫妻與孩子三人同車，萬一車禍帶走她倆，F 將要走向他可以預知的未來（詳後文〈經歷七次晤談的蛻變〉段落）。這個「不再基於害怕再失去」與「害怕三人同車」是同時存在的，也反映了 F 因喪兒所帶來的影響仍在持續中。

但是，經歷喪兒的 F 還是有所不變。諸如：堅強的意志力展現在對作品的堅持、與對命運的不服與抗拒—包括對九二一震災帶來的傷痛亦然、還有完美主義。F 說他其實是更堅持自己「以前不在乎的、或我以前忘記的...」而已（F244）。因此，「不變的是對理念的堅持，改變的是彈性的實踐方式」⁹。

（三）小結：從無奈到作主，發明作品或許是 F 自我治療的歷程

F 在喪兒近四年時，決定以「沈澱」、「膠合」的態度來表達自己，也隱約支持了本研究的最基本立場：視 F 為一整體來探索其蛻變。

從看著女兒的遺體，震驚這種事的降臨，雖然從資料中，F 只反映出逃避、後悔、自責、不捨等，然而，或許所有哀慟者曾經歷的，F 都嘗過了。F 與○○在生前的難以溝通（以表象看人的 F 期待青少年期的○○能夠努力，以成龍鳳，F199），並沒有讓 F 更容易承擔永遠失去女兒的事實；F 反而後悔沒有對她好一點、多點相處和讚美。F 也自責未能接受旁人對違建的擔憂，而女兒就是因那堵牆而去世的。此外，任何有關喪兒的種種，對外人、對家人，F 都不願多談，無論他人提起與否，F 都不自在，只能逃避，或許是因為自己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令他震驚的喪兒之慟，F 還不知道要如何在心中「安置」（locate）這個經驗（Worden, 2002）。但是縱使到喪兒近四年時，F 心中仍同時存有著「害怕眼淚或情緒的潰堤」與「對孩子的思念」，只是不一定會表達出來。

當 F 被喪兒經驗卡住了，一切都回到原點，F 動彈不得，他潛心向內，心中浮出「做自己」的念頭，他要當自己人生詩篇的作者了。因九二一而跌倒，他要自己爬起來，過去被安排的人生，他從此要自己來安排。「...想一想，好吧，那就回到我原始的地方來，反正我對這方面還算蠻專長的，那我走看看嘛，我本來是這樣的心態而已...」（F118）所以 F 為自己找出路的方式是發明一個作品，而這作品對 F 的最大意涵即是把○○生回來，但這也是一條孤寂的路。

除了這個作品外，F 本身亦有極大的改變。例如：為自己在意的事物患得患

失、懂得先瞭解一個人再提供其需求、把握當下、不以貌取人、不過度保護／操縱家人等。但也有所不變之處：例如一些理念與特質。而喪兒經驗所帶來的影響—縱使近四週年—仍是持續而深層的。

在投入發明作品之時，對 F 而言，似乎有助於自己的情緒。在夜深人靜思索著這個作品的進行時，「實際上是...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在對話一樣，一直在對話對話對話，那種對話到最後變成是...不是 power，根本是一種韌性而已嘛，細水長流的那種...持續不斷的那種...」（F309）。○○變成 F 內心的永恆的陪伴者（constant inner companion, Klass, 1996, p.204）。這個經由父女不斷對話而完成的作品，「一方面是一種紀念的一種過程，一方面也是讓自己沈澱下來、穩定下來...」（F535）。或許這個作品的發明，對 F 而言，是一個自我治療的歷程。

三、歷經七次晤談的蛻變

這個段落主要是根據與 F 的七次晤談歷程而來，主要呈現出來的主軸有二：針對 F 的深度瞭解、與 F 經歷七次晤談以來一些較為清晰的蛻變。

（一）對 F 的深度瞭解

「好為人師」是我毫無疑問地認為是最適合描述 F 的特質，從某個角度而言，這也是「應然」，因為 F 已任教二十年有餘。這個特質可從田野筆記的記載看得出來：

F 頗習慣在話題之前來個：「我這樣說妳一定不會相信...」後來想那是他的口頭禪。（引自「第一次晤談筆記」）

通常在講完這句話後，F 會接談他很拿手或很懂的事情，偶爾也會檢查我相信他與否、他所言正確與否（我的回應一隅，詳見前文〈關係的建立與契機〉段落）。在七次晤談後所記錄的田野筆記中，其中有五次晤談我寫到 F 的「好為人師」（出現該詞共 9 次），在訪談逐字稿中，共出現了 27 次「很簡單嘛（啊）」的陳述，似乎表示 F 懂很多事情，教導他人並非難事。在第三次晤談後的筆記，我寫下：

這次我發現似乎 F（談話）的起頭都傾向教我什麼東西，可能是 a. 當老師

的慣性使然；b.那是他讓 meeting 比較不像諮商的方法…⁷（引自「第三次晤談筆記」）

此外，F 也是一個極度科學、理性、以成敗論英雄的人。他自承沒有宗教信仰，「是無神論者」（F207），對於妻子對民俗的深信，F 會斥為無稽。同時，F 知道自己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也「非常好面子」（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與家人的相處，F 是期待與供養的傳統男性角色。

但是這些理性、無神論等印象在晤談大約滿兩小時之後將會有所變化。F 變成感受極為豐富、敏銳，有深層而細膩的心理活動，能勇敢地面對真實的自己，而且非常具靈性（spiritual）。當他在鑽研音響（此為 F 的興趣）時，他會站在鋼琴旁，「『體會』鋼琴的聲音應該是怎麼樣」，F 也說：「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決定一切」（兩引言均引自 2004 年 7 月 19 日之回訪）。F 多次表達自己似乎能夠預知一些事情，包括自己未來的命運，但 F 卻是以抗拒、不服氣的態度面對之，這似乎也顯示了 F 有堅強的意志力和叛逆的本質，對家族、對命運，他都不願再被安排了，他想要做自己，這也是九二一帶來的變化。

針對「好為人師」，F 先是否認，反而指向我，說是因為我學的領域必須「多聽少說」，我才會表現得不像老師，我回應：「…要是這樣的話，你就不會說你們學校的輔導老師都很不怎麼樣了…」而後 F 終於面對自己的這個特質：「他說他會被這個『好為人師』害死，等他退休時，他要去教誰？」也等於是驗證（verify）了我對 F 此一特質的描述。後來，F 接續：「因為我（指研究者）是晚輩，而且讓自己被看透其實很不習慣，畢竟幾十年都這樣過來了…」（本段引言至今均引自「第四次晤談筆記」）。這似乎也解釋了我在「第三次晤談筆記」中記載：「我發現似乎 F（談話）的起頭都傾向教我什麼東西」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讓 meeting 比較不像諮商的方法。」F 透過教導晚輩，可以維持他的面子，可以不必快速地被看透。而「好為人師」的 F 的深層一面是這樣的：

F 說他不喜歡自己常常想很多東西，從很多角度想很多事情；…，I reflected 他一點都不愛自己。他不愛自己能想、能感覺，他 blamed 自己只能以沒有生命的東西為嗜好（e.g., 音響、電子）。他沒養過生物，連植物都最近才開始敏覺它們要什麼…（引自「第四次晤談筆記」）

深層部分的 F 常常是獨自一人的，似乎只能用「責任」作為與他人之交集：「F 似乎真的與其他生命都沒有交集，always alone，對兩位女兒是，對太太是，對原生家庭的長輩 and others 有的可能是責任而已。」（引自「第四次晤談筆記」）

而 F 的完美主義、懂很多事、好面子，F 說這或許與他是家族中的長子長孫有關，「集三千寵愛於一身」（F322），他不想失去這份寵愛，所以他若是要做什麼的話，就要做到最好（引自「第七次晤談筆記」）。也因為家族中的身份，F 的一生都是被安排的，直到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孩子的驟逝。或許是這份完美主義的要求，影響了 F 讓自己表現出懂很多事；而在面對這個天災人禍時，完美不再，「F...有很多的『只好』、『不甘心』、『不服輸』、『逞強』...」（引自「訪談筆記」）。或許這些「只好」，是 F 面對如此的不完美的人生所表達的無奈；而「不甘心、不服輸、逞強」是 F 對命運的抗拒。

從第四次晤談後，我開始注意到 F 需要兩小時的「暖身」才能夠進入較深層的心理層次。我在「第四次晤談筆記」中提到：「（我）反映 F 破了我的紀錄：他必須 warm up for two hours, talk profoundly in the third hour. 非常地ㄍㄨㄥ，F 說可能是他年長於我經常碰到的個案，」而且，F 以「面膜」作為隱喻，意指年紀大的人都要用它來修飾自己。同一次的晤談 F 也說到：「因為我（指研究者）是晚輩，而且讓自己被看透其實很不習慣，畢竟幾十年都這樣過來了...」（引自「第四次晤談筆記」），案主相對於治療者的背景變項與特質似乎影響案主卸下心理防衛的速率。

卸下好為人師和理性的武裝之後，F 深藏著敏感而靈性的本質，有自己的心理頻率；然而 F 的心理頻率也是受到他社會化的武裝歷程所影響，這兩種層面都是 F。對 F 而言，社會化與深層的 F 的分野，約略是在晤談進行兩小時之時。

（二）蛻變

F 在七次晤談所談及的話題，我整理出三個較清楚的改變。我將以田野筆記為主要的依據資料，以描述的方式（narrative）鋪陳。

1. 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主人

F 以「籠子」和「風箏」作為隱喻來提到自己的變化。他在第一次晤談時提到：「他自己好像鳥籠裡的鳥，就是飛不出去當自己。而他最後會在（某一特定）的命運，我回映：『路途上好像有很多的籠子，...其實你都不捨得放』」⁷（引自

「第一次晤談筆記」)。接著他就提到，他很害怕全家三人同車，萬一發生車禍，妻女倆都走了，他覺得自己被迫走向最終命運，他不服氣。在家族，F 備受寵愛的同時，也承擔了許多責任。這些害怕失去妻女、承擔家族責任的事實，即是上述我所說的「籠子」，其實我讀到 F 自願被囚禁，甚至捨不得離開，因為「順天」等於 F 要走向他可預測的終點。

而九二一喪兒的事實，F 覺得「他什麼都沒有了」，妻女、家族的「牽絆」都不重要了，她們也無法進入 F 與○○的對話世界。「這會兒沒人用籠子套住他了，可是他卻不知道怎麼飛」（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所以，喪兒後的 F，似乎並非「飛不出去當自己」，而是自己「不知道怎麼飛」。

在第六次晤談時，F 提到「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重新來過，可以的話，希望可以 out of the bird cage (freedom) and have a space to express himself，他就滿意了」（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從上述對話來看，F 以「籠子」作為隱喻似乎有一進程。雖然 F 夢想著希望可以離開鳥籠，卻不知道該如何飛，但似乎有些跡象可以看到 F 已學著開始飛：F 希望、也決定要自己寫 page two，把自己投入發明作品的孤寂的路。F 已開始自己擔任作者。

F 也以「風箏」作為隱喻。在第六次晤談時，他提到「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斷了線的風箏...」。這個「斷了線的風箏」的隱喻，F 除了曾在第二次長談時，用來描述自己逝去的女兒外，在此次晤談中，他也用來比喻自己，而且「這個斷了線的風箏是有自由意志的...」這裡表示 F 是這個風箏，他要自主地編寫 page two 了。當 F 接續「風箏」的話題，此時是個沒有斷線的風箏：

「那拉住這個風箏的線...」「是抗拒吧！」F 嚇了一跳，拿筆寫在報紙空白處，好像是寫：「線—（應該是『抗拒』之類的字眼吧）。他似乎有很大的感慨。「我沒想到妳會這麼說...」F（表示他）原本（以為我）要講 connection 的意思⁷。（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這個「抗拒」的回映就像是他捨不得離開的鳥籠：F 持續地抗拒他所能預知的未來，他找遍理由讓自己入世（如：親人的繫絆），他放不下身邊所有的東西，抗拒是他呈現他選擇入世的方式。接著，「F 衝擊很大的樣子，又露出痛苦的表情。『那誰在拉那個風箏？』『老天爺吧？』」（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無論是「籠子」或「風箏」，F 似乎原都自願被囚禁、被牽絆，但在喪兒經驗之後，F 逐漸生出一個「做自己」的念頭。雖然籠子打開了，他卻不知該怎麼飛，但他想學著飛；雖然曾和老天爺拉扯、抗拒，但他也想學做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說不定還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2. 換個角度看事情

同樣也是在第六次的晤談，F 突然很嚴肅地和我討論有關大女兒生涯的下一階段，而且他和妻子都希望孩子要唸就要唸最好的學校，我反映出 F 追求表象的價值觀，接著，根據「第六次晤談筆記」：

F 的表情開始又豐富了起來，主要是痛苦，可以看到他有滿腔的話要講，思考、要表達的話擠成一團，這時候我已經不需要說話了，就等他擠成一團的東西排好路隊出來。F 站起來，說：「我現在...突然覺得天空亮了起來...我要是早點遇到妳，我就不會這麼痛苦了...」，...（又）說：「我瞭解的她也是我以為瞭解的她，並不一定真的是她...」我肯定地點頭，他接續：「我應該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他突然冒出來：「就是那個“for your own good”讓我...我從小就是被這樣對待的，我也沒有覺得錯啊，我就這樣對我的小孩...」

F 接著提到「當斷了線的風箏也不錯，說不定還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之後，F 自己又回到○○的話題：

他說或許他自己 control○○，以為自己製作的風箏就要讓她飛得最高，她也可能會有所 complain，...，F 又說了一次：當斷了線的風箏也不錯，說不定還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然後，他決定：當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就好了。意指不要當 controller 了。我說：「為什麼我聽到『悲哀』呢？」F 說人生就是無奈，但是他也不是要回到被安排的日子，「不可能了！」（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F 在同一次晤談說了兩次「當斷了線的風箏也不錯，說不定還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或許反映出這句話盤據他的心思，且 F 由此獲得許多洞察。它需要很多的代換，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極為豐富。當這個風箏是○○、F 是那位執掌風箏

的人時，她既已斷了線，便不再受 F 的控制，說不定她真的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這個風箏可能是 F 自己，另一端是老天爺，當他不再和老天爺拉扯（抗拒他的命運）時，他才真正可以做自己，包括奮力於他的作品、和接受可預知的未來。

到第七次晤談時，F 告訴我，由於上次說那風箏的線是「抗拒」所帶給他的靈感，有關他即將完成的作品，他不要再找大風箏了，他要找風在哪裡，風箏才能飛得高。這又是一次代換，這次「風箏」是指他的作品，而這個作品代表○○重生之義；雖然還是希望風箏飛得高，但是 F 已轉變成要找到適合的風向。從這些不同的代換，似乎 F 看待同一事件的角度已較鬆動，也因之獲得多樣的洞察。

3. 對退休的惶恐

在晤談期間的連繫，曾經一句無心之言，說 F 已提早過退休生活了，F 後來說：「這句話他聽起來怎麼好像針在刺一樣」，後來 F 表達好幾次對退休的擔心：

他說他會被這個「好為人師」害死，等他退休時，他要去教誰？（引自「第四次晤談筆記」）

他對自己即將退休、好像不被需要（而且 F 學的專業是一冷門的領域）、又還沒找到自己要做的事…十分惶恐⁷。（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F 所面對的似乎與一般屆臨退休的成年人無二，這打破了我認為經歷喪兒之慟的哀慟者的看法，因而我覺察到自己似乎以為哀慟者「應該」被他們的喪親經驗所佔據，不會有其它的想法與感受。之後，我在田野筆記中寫下：

現在瞭解了一些東西：「此時此刻的 F 的 issue 不是喪兒所帶來的 trauma 了（雖然我是因為他滿溢的情緒決定協助），而是他的即將退休（恐懼它帶來的空白）」（引自「第六次晤談筆記」）

（三）小結：斷了線的風箏也可以有另一片更美的天空

從害怕不被需要、無法「好為人師」、以家族的責任作為與老天爺抗衡的牢籠，到喪兒後，F 希望當個有自由意志的風箏，甚至覺得「當斷了線的風箏也不錯」，F 希望學會不接受安排，可以想飛就飛，想依戀就依戀。斷了線的風箏，追逐適合的風向，做自己，還是一樣的完美主義、還是一樣的好為人師，但是已

經是自己決定寫 page two 的主體風箏。

F 從自己從事訓導工作多年，卻在失去女兒後才學到「要先瞭解一個人，...給對方他要的東西，才是事半功倍」；從討論大女兒的生涯抉擇而體會的「我應該要站在對方的立場...」；由思索發明的作品所得的洞察：「我...可以從很多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F441）。在經歷喪女後，從生活中、與家人的互動或全力投入的作品，F 學會換個角度或立場，可以更容易瞭解對方，自己也能更有彈性，不再那麼緊繃與僵硬。

這些蛻變中，F 會發展出「換個角度看事情」的原因，根據 F 在效度考驗階段所寄回的書面說明指出：「有些事情到某個年齡和親自體驗或經歷才學會。」F 說，只有到中年，某些發展跡象受退化之苦，我們才學會要從多方面瞭解自己退化的機能，朝減緩老化的方向前進，並學習與之相處。同樣地，親身經歷喪兒之慟，F 才學會要瞭解一個人，要站在對方立場，「才是事半功倍」，「...既成事實的東西，有時候我們都會認為它...本來就應該這個樣子，不會去懷疑背後有什麼問題，但是呢，你用另外一種心態來思考，...，變成從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不是那個樣子，真的，我現在有那個能力可以跳到另外一個角度，好像另外一個心智的你...」（F436）。這與 F 原本希望自製的風箏就要飛得最高，「不會去懷疑背後有什麼問題」，他過去也是以這個“for your own good”的態度與孩子相處；但「有些事情（要）...親自體驗或經歷」，等到失去瞭解○○的機會了，F 才抓住、學習瞭解對方的機會，而現在的「對方」變成是他的學生、大女兒、和對發明作品的思考。

在經歷了七次晤談，F 似乎已跳脫了喪兒的經驗，其改變較著眼於自我與發展的命題。或許喪兒經驗是一個導火線，讓 F 加速對自己生命的檢視與決定，這符合了 Klass（1988）的見解：哀慟者呈現在治療歷程中的議題是十分多元且因人而異的。

肆、討論與結語

無論台灣或英文的哀慟文獻，對父親喪兒資料的建立都十分有限；本研究單以一位父親為對象，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瞭解其喪兒近四年來的蛻變。我與 F 進

行不同型式、前後歷時至少 30 小時的談話，以逐字稿和田野工作後所獲之筆記作為分析之資料。我由資料分析出三個蛻變：因震災的喪兒經驗所帶來的影響、關係的建立與契機、與經歷七次晤談的蛻變。

喪兒經驗帶給 F 的哀傷有其普遍性和獨特性。所謂普遍性是指和其他關係的哀慟者（如：父母、配偶、手足等）類似的哀傷反應，例如：從震驚到麻木、後悔、自責、不捨、不敢再提起、與永恆的思念（林家瑩，1998；葉何賢文，2003；Shuchter & Zisook, 1993; Worden, 2002）。F 對於孩子因自己忽略鄰居的違建而去世，這份自責與 Thompson 和 Range（1992）認為親人意外死亡的哀慟者要比親人自然死亡來得自責或受到責備的發現一致。對於 F 後悔自己未與孩子有多一點正向的互動，這與林家瑩（1998）、Worden（2002）等認為逝者與哀慟者在生前互動情形影響哀慟者的哀傷歷程一致。

而無論震災剛發生，到現在喪兒近四年，F 對任何人都不願多談喪兒經驗，這符合了文獻中對父親的哀傷表達方式的看法（如：林家瑩，1998；葉何賢文，2003；駱麗華等，1981；Martin & Doka, 1996; Wood & Milo, 2001; Worden, 2002），但不符 Schwab（1995）發現子女驟逝的父母親亟想找具相同喪兒經驗的哀慟者訴說。同樣地，F 在震災初期，原本意欲遠離傷心地，卻轉而留下來面對、解決問題，與後來致力於作品的發明，均與 Williams 和 Nikolaisen（1982）、Wood 和 Milo（2001）認為「父親傾向讓自己忙碌，讓自己有所行動」的結果一致；然而，發明作品對於 F 有其獨特之處：F 賦予這個作品代表孩子重生的意義。

F 從一生被安排在“page one”，到意外的人生讓他「歸零」，到他決定自己擔任撰寫“page two”的作者，他集中訪談的主題和心力在發明的作品。F 拾回被自己忽略了廿多年的專長，開始正視自己是一主體。這就像林家瑩（1998）所說的「轉念」、Parkes（1986）所說的「轉捩點（turning point）」的產生，只是從現有資料無法具體看出何時或何事是 F 從歸零到重生的轉捩點，反而是 F 回歸到自己「以前不在乎的、或...忘記的...」專長而形成轉捩點。同時，對 F 而言，這個重生的歷程有 F 與○○對話的兩人世界，如此外人難以體會的世界與 Wood 和 Milo（2001）的發現一致。F 同時亦存有的「害怕眼淚或情緒的潰堤」與「對孩子的思念」，再結合上述父親內斂的哀傷表達方式，F 的哀傷就像 Wood 和 Milo（2001）的父親受訪者的話：「我沒有哀傷得比較少，只是（方式）不一樣而已」（p.655）。而發明作品的歷程似乎也是 F 自我治療的歷程。這似乎也支持了林家

瑩（1998）所言：哀傷歷程同時也是復原的歷程，人似乎有一自我復原的機制得以讓自己的哀傷的強度減弱。

無論時光流逝多少，觸景睹物、或是內心想到與喪兒有關的事，哀痛的感覺彷彿九二一才是昨日之事，這也是我的受訪母親們的反應。Parkes（1986）和 Rosenblatt（1993）也支持，哀傷並非恆存的（constant），而是如海浪般地有起有落。對逝去的孩子持續不斷的關係（continuing bonds）與現今的哀慟文獻一致（如：Klass, 1993; Klass, Silverman & Nickman, 1996; Stroebe, 1992; Shuchter & Zisook, 1993; Worden, 2002），表現在思念、與 F 在發明作品時與○○的同在與對話。F 亦具備處理日常生活的功能，且除與逝者建立隱含的關係之外，仍能與現存的家人建立關係，甚至改善關係，此符合了 Rubin（1981, 1992, 1999）的「雙軌哀慟模式」（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F 不願與聽不懂的人談及喪兒之慟，與林家瑩（1998）的發現一致。而無論朋友是否知曉 F 失去一位女兒，會或不會提及喪兒之事，F 能夠做的，就是逃避，其實恐怕是 F 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而周遭若知情的人也是「刻意去迴避這件事情」，這樣更阻絕哀慟者任何可能想談的機會，親友自己也難以成爲「聽得懂」的人。在台灣，無論是哀慟者本人或是周遭的親友，培養面對喪親經驗的「能力」和「勇氣」似乎是一段漫長的路。

對 F 這位哀慟者而言，要成爲「聽得懂」的人，才能夠聽得到他全心合作的故事。在 F 認爲一個外人可以聽得懂他講的話之前，他似乎有很多的不信任、觀察與忐忑，我在初始的接觸聽到了 F 談的需求，自己也因實地接觸哀慟者而帶來衝擊與反思，而得以結緣。本研究所提及的三個契機並非要強調具象的言行舉止以達到信任關係的建立，而是研究者或治療者的敏感度與態度才是關鍵：讓被研究者或案主感受到被重視、及時敏覺到案主的狀態及心理需求、接受對方的質疑並持續進行反思。

以 PCA 的模式介入 F 的心理治療，從 F 的全人出發，敏覺其可能的覺察或改變，而不著眼於治療效能。在七次晤談中，F 呈現出自己的心理頻率，他必須有兩小時（遠超過一般晤談的 50 分鐘時限）的時間才開始表現較深層的自我¹⁰，這個深層的自我幾乎與 F 平日的自己有一百八十度的不同。雖然喪兒是永遠的慟，但 F 卻仍是有自己當前需要處理的議題；由晤談而自然衍生的命題也與喪兒經驗無直接的關係了：F 要釋放被禁錮一生的自己、懂得比較有彈性地看事物、也對未來的退休生活憂心。其中，要當自己人生 page two 的作者，衍生出自主的

力量，以及能夠較彈性地處世待人，在哀慟文獻中，多認為這是朝向復原（*survival; resolution*）的方向（如：Shuchter & Zisook, 1993）。

若是站在研究者的「客觀」立場，我從兩處看到了 F 的主觀性。第一，F 似乎放大了「不得已的機緣」、「意外的人生」，這或許表示他過去的順遂、被安排、備極寵愛，相對於他意外的喪兒之慟的兩極經驗，在 F 心中所帶來的震驚。第二，在第二次晤談時，F 也提到他「什麼都沒有了」，但其實他還有妻女。然而，當我潛心反思、或當我同理 F（把自己放在 F 的位置），我找到了自己生命經驗中與 F（及其他哀慟者）喪兒經驗相仿之處：當我在意的人永遠離去，我自然地會放大她（他）的重要性，其他仍在我身邊的人便相對地在我的主觀中縮小了，

「Somehow 我在想我的經驗是否是為了感覺哀傷父母的心情？」（引自「第二次晤談筆記」）。因此，哀慟者的主觀知覺都有意義、也都應該被尊重。這讓我想到 Rogers 在晚年時提及自己身為一個治療者時：「我發現當我最接近我內在、直覺的自我，當我與我內在那不知名的角落（*the unknown in me*）接觸時，... 然後我就發現，不管我做了什麼，似乎都是具有療效的，單純只是我的存在（*presence*）對對方而言就是鬆綁而且是有幫助的」（Rogers, 1978, 1979/1980, p.129）。或許 Rogers 所說之「內在不知名的角落」即是案主與治療者的共同點（*common ground*）的匯集之處，只要治療者（或研究者）不斷地反思、自我覺察，或可找到那個共同點（即：或許「我的經驗...是為了感覺哀傷父母的心情」），就可以成為「聽得懂」的人；治療者若能在「內在不知名的角落」找到與案主之共同點，在晤談時，他單純的存在即有助於案主。哀慟者是希望被瞭解的（Schwab, 1995），同時，他們更希望獲得有效能的社會支持系統（Lehman, Ellard & Wortman, 1986; Stylianos & Vachon, 1993），否則或許就如同 F 一般，寧願不說或是「模糊焦點」。

哀慟者經歷過喪親如此深沈的失落，卻願意掏開這份慟，真誠地將故事訴說給研究者聽，我認為「尊重哀慟者及其故事」是為台灣初步建立哀慟文獻的一件重要的事。在研究方面，本文建議更多真正站在哀慟者的立場的研究繼續進行，尤其是質化研究，因為哀傷經驗的個別差異與文化差異已獲相當文獻的支持（如：Rosenblatt, 1993; Rubin, 1981, 1993, 1999; Stroebe, 1992）。哀傷的性別差異也一定程度地獲得支持（如：Bohannon, 1990; Rubin, 1992, 1993; Sprang & McNeil, 1998; Shuchter & Zisook, 1993; Stroebe, 1992），故而，未來的研究或應分別檢視父親與母親之喪兒經驗。此外，大多數的人都有正常的哀傷歷程（Stroebe, 1992），

研究者／治療者或應先瞭解哀慟者的哀傷經驗，而不先以病態（pathological）或複雜（complicated）哀傷的角度出發。從實務工作而言，本文建議以 PCA 模式介入；因為蛻變是一持續不斷的動態歷程，不會因為有無研究者介入訪談與治療而有所停頓，若治療者相信案主的實現傾向，順著案主心理能量的流動，在成長和安全的氛圍中，案主哀傷經驗的方向或速率可能會改變。就專業人員本身而言，無論身為研究者或治療者，反思與自我覺察是無止境的：「外人」只可能越來越接近哀慟者的經驗世界，而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到達。

至於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是在複製的可能性：縱使詳加描述研究歷程因子、具體地使用資料（得以增加信度），今後的研究要複製民族誌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步驟並不容易；同時，PCA 治療模式是一種藝術（Freire & Tambara, 2000），每位實務工作者所表達、詮釋的治療者態度可能有所不同，案主與治療者的互動亦隨而有異，故而可能有不同的歷程與發現。

註 釋

1. 在此，有兩點要說明。第一，「兒」意為「孩子」，沒有性別之分。從文獻來看，台灣以父母親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子女逝去的文獻，至今僅有四篇（李雅玲、陳月枝，1992；林家瑩，1998；葉何賢文，2003；駱麗華等人，1981），多以「子女」作為合併探討逝去之子代；從實際經歷來看，原本我在提出哀傷主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時，曾欲檢視在重男輕女傳統觀念較濃的鄉鎮地區（埔里），哀慟者是否因喪子或喪女而其哀傷反應、歷程有所不同；在實際接觸哀慟者之後，才瞭解自己的這個預設是多麼外圍而殘忍：無論逝去的是子或女，哀慟父母親的哀傷都是深層且長遠的。因為文獻和個人實際接觸哀慟者之經驗，故而決定以中性的字眼表示。第二，全文撰寫過程，我覺察到自己最大的掛慮是在保密（confidentiality）。我希望自己釋出足夠的訊息即可，得以為 F 保留有最大的私密性；但是，在本文，我又必須把與主題有關的脈絡交待清楚，以期對專業領域有所貢獻，故而掙扎在此兩難之中。
2. 這些針對台灣哀慟文獻的數據，是蒐尋「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與「國

家圖書館的『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兩系統所得到的結果。所使用的關鍵字有：九二一、哀（悲）傷、輔導（諮商）、喪親（子、父、母）等字的組合。依出版年次排序，為吳蕙蘭（2001）、李佩容（2001）、李宏文（2001）、林美儀（2001）、林秀芬（2002）、蔡素妙（2002）簡麗珊（2002）、陳瑞君（2003）、施靜芳（2003）。若在正文中引用的，方列入「參考文獻」中。

3. 有關訪問者與受訪者的編碼，詳閱〈資料蒐集與記載〉段落。
4. 有關「田野筆記」的命名，詳閱〈資料蒐集與記載〉中之表一。
5. 自九二一震災始，我從災後心理重建的實務工作做起，進行大學生的志工與社區志工的培訓，繼之進行三年的國科會研究計畫都是與九二一震災有關的主題。從實務和研究，我都有機會深層地接觸受災者和哀慟者，也相當程度地能夠瞭解他們。
6. Worden（2002）的“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在臺灣頗為盛行，它將哀傷諮商與哀傷治療的區別定位在：前者是處理正常的哀傷（normal or uncomplicated grief），後者是處理異常的哀傷（complicated or unresolved grief）。本文並不做這樣的見解。
7. 引用的文字裡，括號中的字辭是在不違其原意的前提下，為了讓引用的文字讀起來更加通順而增添。
8. 根據 Rogers（1970），會心是一種「與日常生活中比起來，個體之間在心理上有更接近、更直接接觸的經驗，它是團體經驗中，最重要、intense、促發改變的層面之一。」（p.33）
9. 這個結論加上引號且為肯定用語，實為 F 的用字（效度考驗階段）。
10. 在我的實務經驗中，需要有大於 50 分鐘的晤談時間，才開始做到「暖身」者，F 已經不是第一位了。
11. 本文作者感謝文中的這位父親，他願意掏開自己的傷痛，允許我陪伴他走這一段哀傷的路。我也感謝他已逝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以走這段路的方式，我和她們結緣。同時，我也感謝國科會，因為執行國科會所通過的研究計畫之機緣（NSC90-2413-H260-007），我才得以與這個哀慟家庭結緣。
12. 我想將此論文獻給瞬間被迫將哀傷放入自己生命經驗學習單之中的人們——無論是大型災難或單獨受災所造成親人驟逝的哀傷。或許身為哀慟者就

會知道，面對哀傷是需要勇氣的。然在死亡或喪親之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曾經、正在或會是哀慟者或陪伴者，所以，或許我們都該學習面對哀傷的勇氣、學習陪伴哀慟者的哀傷。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王純娟，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e-mail:cw9j@mail.nhlue.edu.tw，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03)822-7106

收件日期：2005 年 10 月 27 日

通過日期：2006 年 1 月 2 日

參考文獻

- 王純娟（編）（2002）。**讓我們一起來：九二一災後心理重建演講輯錄**。南投縣：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0）。**九二一大地震重要統計數字**。台灣：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 李雅玲、陳月枝（1992）。癌症死亡兒童的母親其哀傷反應及調適行為之研究。**護理新象**，2（7），405-427。
- 林美珠、田秀蘭譯（2000）。**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台北：學富。
- 林家瑩（1998）。**喪失子女的父母失落與悲傷反應及復原歷程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幸玲、卓紋君（2004）。一位受暴婦女的在信念與生命轉換歷程：詮釋學的觀點。**中華輔導學報**，15，61-96。
- 黃慧涵（1992）。**青年學生對父母過世的哀傷反應、調適行為與家庭關係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何賢文（2003）。**悲傷調適歷程及生命意義展現之研究—以喪子（女）父母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駱麗華、陳蓉蓉、陳月枝（1981）。悲逝—痛失愛子父母的哀慟過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成立廿五周年專刊**，71-78。
- Armour, M. (2003). Meaning making in the aftermath of homicide. *Death Studies*, 27, 519-540.
- Berg, B. L.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Bohannon, J. R. (1990). Grief responses of spouse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a child: A longitudinal study.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2(2), 109-121.
- Bohart, A. C. (1995). If we dance, who leads? *Person-Centered Journal*, 2(1), 35-37.
- Brabant, S., Forsyth, C., & McFarlain, G. (1995). Life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Initial and long term support from other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1(1), 67-85.

- Charkow, W. B. (1998). Inviting children to grief.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2*(2), 117-122.
- Cook, A. S. (1995). Ethical issues in bereavement research: An overview. *Death Studies, 19*, 103-122.
- Cook, J. A. (1983). A death in the family: Parental bereavement in the first year.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3*, 42-60.
- Corr, C. A. (1998). Enhancing the concept of disenfranchised grief.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8*(1), 1-20.
- Corsini, R. J. (2000). Introduction. In R. J., Corsini, & D. Wedding (Eds.),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pp. 1-15). Itasca, IL: F. E. Peacock Inc.
- Davis, B., Gudmundsdottir, M., Worden, B., Orloff, S., Sumner, L., & Brenner, P. (2004). "Living in the dragon's shadow" Fathers' experiences of a child's life-limiting illness. *Death Studies, 28*, 111-135.
- Farnsworth, E. B., & Allen, K. R. (1996). Marginalized families: Mothers' bereavement experiences of marginalization, stories of change. *Family Relations, 45*, 360-367.
- Freire, E., & Tambara, N. (2000). Client-centered therapy: The challenges of clinical practice. *Person-Centered Journal, 7*(2), 129-138.
- Klass, D. (1988). *Parental Grief: Solace and Resolution*. NY: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Klass, D. (1993). Solace and immortality: Bereaved parents' continuing bond with their children. *Death Studies, 17*, 343-368.
- Klass, D. (1996). The deceased child in the psychic and social worlds of bereaved parents during the resolution of grief. In D. Klass, P. R. Silverman, & S. L. Nickman (Eds.),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pp. 199-215). PA: Taylor & Francis.
- Klass, D., Silverman, P. R., & Nickman, S. L. (Ed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PA: Taylor & Francis.
- LeCompte, M. D., & Goetz, J. P. (2001). Problem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Bryman (Ed.), *Ethnography (Volume 3)* (pp. 100-132). London, UK: Sage.

- Lehman, D., Ellard, J., & Wortman, C. (1986). Social support for the bereaved: Recipients' and providers' perspectives on what is helpful.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438-446.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 Martin, T., & Doka, K. J. (1996). Masculine grief. In K. J. Doka (Ed.), *Living with Grief: After Sudden Loss* (pp. 161-171). Bristol, PA: Taylor & Francis.
- Murphy, S. A. (1990).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llowing accidental death of a child.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22*(3), 174-179.
- Murphy, S. A., Gupta, A. D., Cain, K. C., Johnson, L. C., Lohan, J., Wu, L., & Mekwa, J. (1999). Changes in parents' mental distress after the violent death of an adolescent or young adult child: A longitudinal prospective analysis. *Death Studies, 23*, 129-159.
- Neuman, W. L. (1997).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3rd ed.).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 Parkes, C. M. (1986). *Bereavement: Studies of Grief in Adult Life* (2nd ed.). Madison, Connecticu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Parkes, C. M. (1995).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ethical bereavement research. *Death Studies, 19*, 171-181.
- Parkes, C. M. (1997). Help for the dying and bereaved. In C. M. Parkes, P. Laungani, & B. Young (Eds.), *Death and Bereavement Across Cultures* (pp. 206-217). London, UK: Routledge.
-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Rando, T. A. (1986). The unique issues and impact of the death of a child. In T. A. Rando (Ed.), *Parental Loss of a Child* (pp. 5-43). Champaign IL: Research Press Co.
- 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2), 95-103.
- Rogers, C. R. (1959).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Formulations of the Person and the Social Context* (pp. 184-256). NY: McGraw-Hill.
- Rogers, C. R. (1970). *Encounter Groups*.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Rogers, C. R. (1978, 1979/1980). The foundations of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In C. R. Rogers, *A Way of Being* (pp. 113-136).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Reprinted from *Education* (1979, Vol. 100, No. 2, pp. 98-107) and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78, Vol. 18, pp. 23-26)]
- Rosenblatt, P. C. (1993). Grief: The social context of private feelings.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102-1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latt, P. C. (1995). Ethic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with grieving families. *Death Studies, 19*, 139-155.
- Rubin, S. S. (1981). A 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1*(1), 101-109.
- Rubin, S. S. (1992). Adult child loss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4*(3), 183-202.
- Rubin, S. S. (1993). The death of a child is forever: The life course impact of child loss.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285-2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bin, S. S. (1999). The two-track model of bereavement: Overview,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eath Studies, 23*(8), 681-714.
- Sanders, C. M. (1993). Risk factors in bereavement outcome.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255-2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b, R. (1995). Bereaved parents and support group participation.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2*(1), 49-61.
- Sharf, R. S. (2004). *Theories of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Concepts and Case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 Shuchter, S. R., & Zisook, S. (1993). The course of normal grief.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23-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rang, G., & McNeil, J. (1998). Post-homicide reactions: Grief, mourning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a drunk driving fatality.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7(1), 41-58.
- Stevenson, L. (1987). *Seve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2nd E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oebe, M. (1992).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A review of the grief work hypothesis.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6(1), 19-42.
- Stylianou, S. K., & Vachon, M. L. S. (1993).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bereavement.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pp. 397-4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bot, K. (1997). Mothers now childless: Survival after the death of an only child.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4(3), 177-189.
- Talbot, K. (1999). Mothers now childless: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death of an only child.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8(3), 167-186.
- Thompson, K. E., & Range, L. M. (1992). Bereavement following suicide and other deaths: Why support attempts fail.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26(1), 61-70.
- Wheeler, I. (1999). The role of linking objects in parental bereavement.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38(4), 289-296.
- Williams, R. A., & Nikolaisen, S. M. (1982).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Parents'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to the loss of their infant.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 5, 55-61.
- Wood, J. D., & Milo, E. (2001). Fathers' grief when a disabled child dies. *Death Studies*, 25, 635-661.
- Worden, J. W. (2002).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3rd ed.).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

The Psychosocial Transition of a Bereaved Father

Chun-Chuan Wang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psychosocial transition of a father who lost his daughter during the 1999 Taiwan Earthquake. The transition of this father in terms of his level of trust upon the researcher, impact of grief experiences, and possible growth was the principal focus of this study.

The present study utilized an ethnographical method to derive data from various forms of interaction from the father. Three long conversations, one in-depth tape-recorded interview, seven sessions of therapy, field notes, as well as the verbatim text of the recorded interview, were being used as primary data sources. Three themes then were extracted, including: relationship establishment, the influences of the bereavement, and changes triggered by therapy.

For the first theme, this study explored three possible aspects that facilitated the father's willingness to share his story. For the second theme, the universalities and uniqueness in the father's grief, as well as th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ather of the experience of sudden loss were investigated. Regarding the third theme, based on principles deriving from Person-Centered therapy, possible changes after therapy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bereavement, ethnography, grief therapy, the 1999 Taiwan Earthquake, Person-Centered Approach